

## 滿洲尚武文化再檢視—— 以康熙朝創發方略為例

馬雅貞\*

方略為清代康熙朝新創的官修史書，乾隆朝以降一直到光緒朝相繼都有修纂，經常是現代史家援引的史料來源。近來學界逐漸跳脫傳統視方略為史料的角度，一方面意識到方略作為官修史書的特殊性，以及其中對官方文書的選擇性編輯；另一方面也以清帝國的尚武文化，來說明清廷之所以新創此獨特的官修史書。然而，若將此二方面合而思之，清宮之所以新創此特別體例的官修史書，與提倡軍事文化的具體關係為何仍有待解釋，而須進一步考察其特殊體例的由來，確認其之所以出現的脈絡，並分析其所造成的效應，才能綜論康熙創發方略、且為乾隆等之後清帝傳承的意義。雖已有學者指出清代方略很可能受到明代關於特定戰事依照時序編輯的奏議集之影響，但其中的關聯與意義還有待釐清。事實上明代到康熙朝戰事相關奏議集相當盛行，不僅只是對個人為官或特定戰爭的紀錄，更成為官員之間自我表述的重要媒介，並影響到此類文本定位的變化。本文先探討明代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發展，接著討論康熙時期官員戰事相關奏議集的變化，最後論析前二者與康熙宮廷方略編纂的關係，餘論則說明乾隆朝方略的轉變與定位。希冀透過溯源與對照，重新理解康熙皇權新創方略的意義和發展，以及和明朝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與官員文化的關係，並由此再觀察滿洲尚武文化的特色。

關鍵詞：方略、奏議、康熙、皇權、尚武文化

---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 一、前言——與方略相關的多元議題

以往由於清宮一再宣稱騎射為滿洲之根本，加上大量製作戰碑、方略、戰圖等，學界對於滿洲的尚武文化多所提及，認為和滿族的傳統有關。<sup>1</sup>最近的研究透過溯源明代個人戰勳畫的傳統，發現過去學者認定為代表清宮軍事文化的戰圖，其實和轉換明代士大夫的視覺文化息息相關，而讓吾人對滿洲武勳文化有了不一樣的理解；<sup>2</sup>同時也提醒我們，過往視為理所當然的清史材料，或許在不同角度的探索下，會展現前所未有的歷史脈絡。本文即以康熙朝(1622-1722)創發方略為例，再次反思滿洲的尚武文化。

方略為清代康熙朝新創的官修史書，盛清宮廷編纂尤多，乾隆朝(1736-1795)以降一直到光緒朝(1875-1908)相繼都有修纂，乃針對特定戰爭依照時間順序先後，將上諭和奏摺等宮廷檔案編纂而成，經常是現代史家討論清代戰事或邊務時援引史料的來源。不過，近來學界逐漸跳脫傳統視清朝方略為史料的角度，發現不論從其體例、編纂過程對文書的篩選與編輯、或是清代軍事文化的一環等來看，這些為數不少的方略並非理所當然的一手文獻，而必須重新加以檢視。以方略的體例來看，姚繼榮認為方略可說是「紀事本末體史書的新形式」，

<sup>1</sup> 相關的研究很多，茲舉以清代軍事文化的專書為例 Joanna Waley-Cohen,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London: I. B. Tauris, 2006).

<sup>2</sup> 關於對滿洲尚武文化的反思，參馬雅貞，《刻畫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Ma Ya-chen, "War and Empire: Images of Battle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in *Qing Encounters: Art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edited by Petra Chu and Ding Ning, 258-272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15).

有別於南宋袁樞(1131-1205)《通鑑紀事本末》之後多數續作都是對既有史書的改編本，而是屬於「資料匯編性質的紀事本末體史書」；並且相對於傳統紀事本末體史書以私撰為主，清代方略則是官修的「一事一書」。<sup>3</sup>就方略的史料編纂來說，濮德培(Peter C. Perdue)與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發現清代方略有時會對檔案大加編輯，而且軍機處方略館會壓制公布有些極為秘密往來的奏摺。<sup>4</sup>以清代的軍事文化而論，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認為方略乃清廷紀念戰爭文化的一部分，與清宮藉由軍禮、戰碑等提倡軍事文化密切相關。<sup>5</sup>這些對清代方略的反思，一方面意識到方略作為官修史書的特殊性，以及其中對官方文書的選擇性編輯；另一方面也觸及為何清廷新創此獨特官修史書的議題。然而，若將此兩方面合而思之，清廷之所以創立此特別體例的官修史書，與清朝提倡尚武文化的具體關係為何仍有待解釋，而必須進一步考察其特殊體

<sup>3</sup> 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北京：西苑出版社，2006)，頁4。

<sup>4</sup>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63-494; Beatrice S.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225-228.

<sup>5</sup> Joanna Waley-Cohen,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45. 另外，清宮製作的戰爭相關碑刻多以平定某地告成太學為題，與歷代常見記述戰勳的紀功碑不完全相同；再加上歷代紀功碑除了紀錄戰功，也不乏記載水利之治功者，如「隋梁公堰紀功碑」、明「吳淞江紀功碑銘」和「盱眙紀功碑序」等，故本文以戰碑泛稱清廷豎立的戰爭相關碑刻。陳思，《寶刻叢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5，頁249-271；張內蘊，《三吳水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6，頁576-615；董裕，《董司寇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清雍正十三年宸翰閣刻少保公全集本影印)，卷3，頁560-578。

例的由來，釐清其之所以出現的脈絡，並分析其所造成的效應，才能綜論康熙創發方略、且為乾隆等之後清帝傳承的意義。換句話說，與方略相關的議題其實遠比過去所理解更為多元，<sup>6</sup>以下先舉最值得注意的來源和定位稍加說明，以作為之後論述的引子。

關於清代方略體例的來源，雖然康熙年間編纂的《平定三逆方略》自有表述，但若仔細推敲，卻不免引人疑義。韓菱(1637-1704)〈平定三逆方略序〉提及：

覺羅勒德洪等謹議，臣聞歷代紀載功烈，俱有成書。迄今可攷者，唐興元間有紀功述，元和間有平蔡錄、平淮記，會昌間有

<sup>6</sup>除了本文所討論的平定戰事之方略，清宮還數度編纂《治河方略》。包括康熙四十年(1071)張鵬翮(1649-1725)請以《治河方略》編纂成書卻為皇帝斥之，但仍讓張鵬翮試編輯之；不過之後可能並未在康熙朝繼續，而是到了雍正三年(1725)才有明確如方略副總裁官的紀錄，編纂完成進呈後，雍正皇帝下令繕寫三部發給河臣；之後於嘉慶朝(1796-1820)又再有新的編纂。目前僅存乾隆和嘉慶的刻本，對於清宮之所以編纂《治河方略》，還有待更多的研究。另一方面，歷代不無「治河方略」，例如元代《治河圖略》即附有〈治河方略〉，雖然過去的〈治河方略〉不盡是紀錄而多為建言，但比起康熙朝創發的平定戰事方略，卻是其來有自。因此，清宮所編輯的《治河方略》，和康熙朝創發平定戰事方略不盡相同，其間的關係尚需更多的研究才能釐清，此處暫而不論。張廷玉，《澄懷園文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5，〈遵例自陳第一疏〉，頁353-360；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聖祖本紀二〉，頁209-258；王先謙編，《東華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7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據清光緒十年長沙王氏刻本影印)，雍正十五，頁37b；王先謙編，《東華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7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據清光緒十年長沙王氏刻本影印)，嘉慶三十四，頁15b；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據道光二年阮元《學經室集》外集影印)，卷69，史部25，頁611-612。徐福齡，〈《治河方略》〉，《中國水利》，1987：4(北京，1987.4)，頁42。

伐叛記；宋建隆間有龍飛日曆，天禧間有聖政記，熙寧間有經武要略；明洪武間將征伐次第彙為日曆，歲之金匱。<sup>7</sup>

儘管其中所列都是史籍有載的過去記述戰爭之書籍，但這些文本到清代多已不存，而難以確認其貌。類似紀錄戰事的書籍其實還有很多，姚繼榮就提到除了勒德洪所舉各書外，還有唐代裴矩(547-627)的《(隋)開業平陳記》、北宋石介(1005-1045)的《三朝聖朝記》、南宋郭居仁的《蜀鑑》、元代王鶚(1190-1273)的《聖武親征錄(聖武親征記)》。到了明代，這類書籍就更多了。宋濂(1310-1381)的《洪武親征錄》、李化龍(1554-1611)的《平播全書》、郭子章(1543-1618)的《黔中平播始末》、楊寅秋《平播錄》、馬文升(1426-1510)的《西征石城記》和《撫安東夷記》、丘濬(1418-1495)的《平定交南錄》、王軾(1439-1506)的《平蠻錄》、曹履泰的《靖海紀略》以及高岱的《鴻猷錄》。<sup>8</sup>

其中元明以降的不少書籍如王鶚的《聖武親征錄》、李化龍的《平播全書》、和收入在袁褰(1495-1573)《金聲玉振集》的馬文升記等，《四庫全書總目》都有列出，<sup>9</sup>在康熙年間應該不是不為人知而有所流傳，但為何勒德洪卻僅祖述佚失的文本？若考慮其所提及的書籍或是皇帝詔令編纂，或紀錄皇帝征伐，均是與皇帝有關的著作，的確與《平定三逆方略》的編纂脈絡較為接近，後文會再討論；相對於姚繼榮所列的多數書籍其實是以個別官員為中心，是自己、幕僚甚或後世所輯而十分不同，很可能便是為什麼勒德洪只列出上述已佚書籍的原因。然而，若再對照姚繼榮所列明代書籍的體例，主要都是個別官員關於特定戰事依照時序編輯的奏議集，而與清代方略按時間先後將上諭

<sup>7</sup> 勒德洪等，《平定三逆方略》(收入《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6輯，第104冊，臺北：大通出版社，1987)，卷1，頁3。

<sup>8</sup> 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頁195。

<sup>9</sup>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52、54，頁474、485、477。

等編纂而成的方式十分雷同，可以說都是強調用「原始史料／檔案／官方文獻」來編年戰爭的做法，姚繼榮也認為清代方略應該是受到明代這類書籍的影響，<sup>10</sup>下文還會討論兩者在收入史論、評點、和以個人(官員或皇帝)為中心的編纂類型等其他類似之處。<sup>11</sup>倘若如此，那麼勒德洪的宣稱就特別值得玩味。他沒有選擇當時可見的、但應該是與清代方略體裁有別的如元代《聖武親征錄》，卻追溯自當時已佚的與歷代皇帝有關的書籍；儘管實質體例上清代方略與上述個別官員關於特定戰事的奏議集更為密切，他卻完全不提這些當時有所流傳的此類文本。兩相對照下，不禁讓人揣測其中是否有所玄機？也就是說，勒德洪刻意祖述當時已經不存在的、與歷代皇帝戰事有關的書籍，而非直到今天仍留存的元代《聖武親征錄》，無法對證就不會給人方略的體例和過去皇帝參與戰事的編纂(如元代《聖武親征錄》)有所不同的印象，反之卻有模糊或遮掩方略體例其實和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類似的效果。

以上所言和清代方略體例接近的明代官員關於特定戰事的奏議集，雖是依時序集結個人奏議而成，但書名並無「奏議」、「奏疏」等字眼而特別以平定戰事為名，和過去以個人或官職等命名如陸贄(754-805)《陸宣公奏議》或范仲淹(989-1052)《政府奏議》為主的奏議集不同，乃明代新興的奏議集類型而鮮為學界所論。<sup>12</sup>與此類標題強調

<sup>10</sup> 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頁 195。

<sup>11</sup> 當然清代方略和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還是有所差異，後文也會針對編纂的部分加以討論。不過，匿名審查人也提醒，不論清代奏摺的機密性、方略所記的戰事規模、決策核心的議政方式等歷史脈絡來看，都和明代不同，而讓清代方略有其特色。

<sup>12</sup> 清代方略的來源模糊，除了體例來自個人戰爭相關奏議集此類非一般熟悉的源遠流長之文本類型外，其名稱的由來也不清楚。「平定□□方略」過去多見於臣僚向上級或皇帝呈疏的脈絡，如宋元豐五年(1082)「廣西漕臣

戰事奏議集相似者，還有書名保留人名和「奏議」等詞，但加上戰爭或者邊事地區者，如田世威《平虜疏議》、<sup>13</sup>或石茂華(1522-1583)《毅庵總督陝西奏議》。<sup>14</sup>這些和戰事有關的奏議集在明清並無統一名稱，為便於討論，本文以官員或個人的戰事相關奏議集稱之。

進一步檢視明代以來官員戰事相關奏議集的發展，下文的討論會發現此類文本在明代的數量很多，其作用不僅只是對個人為官或特定戰爭的紀錄，更成為子孫表彰先人，乃至官員之間自我表述的重要媒介；並且一直到康熙朝都還相當盛行，可以說是官員文化的一環，而特別值得與勒德洪的宣稱來對比思考。以姚繼榮提到的李化龍的《平播全書》、郭子章的《黔中平播始末》、楊寅秋(1547-1603)的《平播錄》為例，就可看到針對同一事件，參與其中的官員透過其奏議集各自表述。《四庫全書總目》即言郭子章「晚年退休家居，聞一二武弁造作平話，左袒化龍，飾張功績，多乖事實。乃仿紀事本末之例，以諸奏疏稍加詮次，復為此書，以辨其誣。」<sup>15</sup>在康熙朝也有如楊捷(1617-

馬默上平蠻方略，以為勝負不在兵」或明楊博「覆光祿寺卿章煥條上平倭方略疏」，和清代方略用以指稱集結皇帝上諭等的編纂很不相同。王應麟，《玉海》，卷 25，頁 35b；楊博，《本兵疏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47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萬曆十四年師貞堂刻本影印)，卷 3，頁 30-31。

<sup>13</sup> 朱睦㮮，《萬卷堂書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清光緒二十九年長沙葉氏觀古堂書目叢刊本影印)，卷 2，頁 5b；王道明，《笠澤堂書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頁 36a-38a。

<sup>14</sup> 石茂華，《毅庵總督陝西奏議》(收入姜亞沙、經莉、陳湛綺主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9，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sup>15</sup>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54，頁 485。但「左袒化龍」應為「左袒逆龍」，參廖可斌，〈《征播奏捷傳》的成書方式和思想傾向〉，《文

1690)《平閩記》、<sup>16</sup>鄂海(?-1725)《撫苗錄》、<sup>17</sup>施琅(1621-1696)《靖海紀事》等不少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刊刻。<sup>18</sup>雖然錢穆(1895-1990)《國史大綱》對清代「諸臣亦不敢自刻奏議，恐以得罪」的觀察的確適用乾隆朝，<sup>19</sup>但康熙朝官員不僅仍流行刊刻奏議集，更可見如施琅《靖海紀事》在每則奏議後均「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讚賞的特別作法，<sup>20</sup>比起前引明代郭子章「以諸奏疏稍加詮次……以辨其誣」而言，<sup>21</sup>施琅《靖海紀事》的獨特作法積極地展現地方菁英對他的認同。施琅的例子並非特例，下文有更多討論，但也顯示在全面理解明代以來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發展之前，是不能說明康熙朝戰事相關奏議集出版的獨特性，更遑論探究又為何於乾隆朝消失，以及勒德洪在康熙朝戰事相關奏議集仍流行的脈絡下，為什麼完全不談方略與此類文本的關係。

明代到康熙朝個別官員戰事相關奏議集的盛行，還影響到此類文本定位的變化。若檢索《四庫全書總目》，會發現大多數標題無「奏議」等的此類文本並非隸屬「詔令奏議類」，而是納入「雜史類」；

學遺產》，1(北京，2015)，頁114-117。

16 「是編皆其康熙十七年剿鄭成功時奏疏及箋、啟、咨文、牌、檄、告示諸稿」，見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54，頁490。

17 東京東洋文庫所藏冊1-6《撫苗錄》為奏疏，冊7-8為《紅苗歸化恭紀詩·紅苗歸化恭紀詩跋》。鄂海、車鼎晉編，《撫苗錄》(東京東洋文庫藏，康熙五十二年序刊本)。又，鄂海、車鼎晉編，《撫苗錄》(收入《史料七編》，臺北：廣文出版社，1978，據國立中央研究院藏本影印)。

18 《靖海紀事》「為康熙間施琅征臺灣之奏疏」，第三節有進一步的版本說明與討論。施琅，《靖海紀事》(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3種，重印於《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6冊，臺北：大通書局，1987)。

19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收入錢穆，《錢穆先生全集(新校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923。

20 施琅，《靖海紀事》。

21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54，頁485。

雖然《四庫全書總目》是乾隆朝所輯，卻也相當程度反映了盛清的官方意見，而值得思考其於明清的意義，以及與方略的關係。《四庫全書總目》對「詔令奏議類」的說明：

記言記動，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錄蔑聞焉。王言所敷，惟詔令耳。《唐志·史部》，初立此門。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則移制誥於「集部」，次於「別集」。夫渙號明堂，義無虛發，治亂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樞機，非僅文章類也。抑居詞賦，於理為褻。《尚書》誓誥，經有明徵。今仍載「史部」，從古義也。《文獻通考》始以「奏議」自為一門，亦居集末。考《漢志》載奏事十八篇，列《戰國策》、《史記》之間，附《春秋》末。則論事之文，當歸「史部」，其證昭然。今亦並改隸，俾易與紀傳互考焉。<sup>22</sup>

一則論證將兩者從集部改入史部的原因，另則不無暗示王言詔令的政治位階高於文學，當然也就高於官員的論事之文。然而，「詔令奏議類」中涵括的個人奏議集多半以標示個人或官職如《兩垣奏議》為主，僅有少數的標題標舉治理地區如王紀《畿南奏議》、或事項如李化龍《治河奏疏》，<sup>23</sup>和戰爭相關的奏議集如萬正色(1637-1691)《平岳疏議》更是有限。

相反的，《四庫全書總目》所囊括的標題無「奏議」之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則多半被放入「雜史類」，其說明言：

「雜史」之目，肇於《隋書》。蓋載籍既繁，難於條析。義取乎兼包眾體，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遺記》、《汲冢瑣語》得與《魏尚書》、《梁實錄》並列，不為嫌也。然既系史名，事

<sup>22</sup>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55，頁 492。

<sup>23</sup>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55、56，頁 500、508-509。

殊小說。著書有體，焉可無分。今仍用舊文，立此一類。凡所著錄，則務示別裁。大抵取其事系廟堂，語關軍國。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只一家之私記。要期遺文舊事，足以存掌故，資考證，備讀史者之參稽云爾。若夫語神怪，供談啁，裏巷瑣言，稗官所述，則別有雜家、小說家存焉。<sup>24</sup>

很可能因為相對於「詔令奏議類」所收個人奏議集的名稱，不論是個人、官職、地區或事件，最後都清楚地冠以「奏議」或「奏疏」等詞；但許多戰爭相關奏議集的標題在明清經常已經不標出「奏議」等詞，而以戰事總稱。除上文所列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雜史」就還有不少例子，如王軾《平蠻錄》：「是編所錄，即其奏捷之疏也」、秦金(1467-1544)《安楚錄》：「是書乃其以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討平獠寇所作也。卷一為敕諭、卷二卷三為奏疏、卷四卷五為檄文、卷六至卷九為題贈詩文、卷十附錄封邱遺事」、方民悅(1505-?)《交黎撫剿事略》：「嘉靖二十八年安南范子儀及瓊州黎那燕入寇，時歐陽必進方總督兩廣……民悅述其始末為此書。卷一為地圖、卷二至卷四為奏疏、卷五為公移」、焦希程《平夷功次錄》：「希程在四川時，值宜賓夷人作亂，巡撫張臬檄委希程剿平，因匯刻當時部檄以成是書」、李化龍《平播全書》：「前五卷為進軍時奏疏、六卷為善後事宜奏疏、七卷為咨文、八卷至十一卷為牌票、十二卷至十四卷為書札，十五卷為評批、為祭文」等。<sup>25</sup>基本上這些書籍均是以奏疏等官方文書為核心的編纂，但名稱已不同於「詔令奏議類」所收個人奏議集的標題，莫怪乎能夠改入「雜史類」。儘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並非沒有意

<sup>24</sup>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51，頁 560。

<sup>25</sup>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53，頁 477-479、484-485。

識到這些文本不無「匯刻當時部檄以成」，<sup>26</sup>但強調有些「大抵書記胥吏所為」，<sup>27</sup>故未視作是為官者的個人奏議集；另則或許如《安楚錄》、《交黎撫剿事略》、《平播全書》之例，不乏加入其他內容如題贈詩文、地圖、祭文者，也難以完全歸類為「奏議類」，所以將之納入「載文即記事」的「具一事之始末」之「雜史類」。換個角度來看，正因為明清戰事相關奏議集主題特殊，不論是標題或內容都更為彈性，歸屬的類別也就不限於「詔令奏議類」，而得以跨越成為「具一事之始末」的「雜史類」。

相對來看，方略在《四庫全書》隸屬「凡一書備諸事之本末，與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者，總彙於此。其不標紀事本末之名，而實為紀事本末者，亦併著錄」的「紀事本末類」，<sup>28</sup>但同樣「具一事之始末」的明清戰事相關奏議集或因「若夫偶然記載，篇帙無多，則仍隸諸雜史傳記，不列於此焉」和「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而劃屬雜史。<sup>29</sup>然而，對照前述明清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與方略體例的密切關係，兩者卻在《四庫全書》中分屬史部的不同類別，容或應該再對比思考兩者分隸的意義。

為釐清上述議題，本文依時序首先探討明代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發展，接著討論康熙時期官員戰事相關奏議集的變化，最後論析前兩者與康熙宮廷方略編纂的關係，餘論則說明乾隆朝方略的轉變與定位。希冀透過長時段的溯源與對照，重新理解清代新創方略的意義和發展，以及和明朝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關係，並由此再思考過去視為滿洲尚武文化代表之一的方略創發於康熙朝之意義。不過需加以說

26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53，頁 484。

27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54，頁 485。

28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49，頁 437。

29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49、51，頁 437、460。

明的是，本文討論康熙朝方略以《平定三逆方略》和《親征平定朔漠方略》為主，因為雖然康熙朝修纂的方略尚有《平定察哈爾方略》、《平定海寇方略》、《平定羅剎方略》等，但根據姚繼榮的研究，這些方略或卷帙偏小而不成形，或秘而不傳等。<sup>30</sup>再加上乾隆《四庫全書》也只收錄《平定三逆方略》和《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亦可見此二方略的代表性，所以本文僅討論此二者。

## 二、明代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盛行與變形

學界很早就已經注意到明人刊行奏議集的流行，不過以往學者大半強調多人奏議匯編如《皇明疏議輯略》等的彙集，<sup>31</sup>但其實除了經世文類之外，還有以事件為中心的總合編纂，如《朝野申揅疏》等，<sup>32</sup>顯示奏議集在經世致用外，尚有其他文化面向可以再加探討。尤其過去鮮少意識到明代個人奏議集的數量與種類更是大幅增加，並影響到其

<sup>30</sup> 《平定海寇方略》僅存未成稿本，《平定察哈爾方略》只有抄本，現代出版的《平定羅剎方略》則是從光緒功順堂叢書刊本重印。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頁 78-81。

<sup>31</sup> 例如 Wolfgang Franke, "Historical Writing during the Ming,"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1*, edited by Frederick W. Mote, Denis Twitchett, 73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譯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張書生、楊品泉等譯，〈明代的歷史著述〉，收入《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785；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文化現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43；楊艷秋，《明代史學探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 232-241。

<sup>32</sup> 劉光復編，《朝野申揅疏》(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刊本)。另外，《皇明馭倭錄》：「蓋列聖之召旨、諸臣之章奏、公私創革之始末、中外戰守之機宜」，其中章奏比例不少，或也可視之為廣義的多人奏議匯編。王士驥，《皇明馭倭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

在目錄學分類的變化，更遑論討論其相應的歷史意義。在此所謂明代個人奏議集指的是彙集個別官員的奏疏，兼收皇帝敕諭、檄文、咨文等官方文書，有時還有作者的傳記資料，甚至包含書札、題贈詩文等相關文字的合集；少數層級較低的官員，則以部檄等公移文件為主。個人奏議集的編纂自宋代起就逐漸增多，刊刻的除了名臣之奏議外，也不乏以文學成就知名的士大夫。個人奏議集亦首度獨立出現在南宋四部「集部」的分類中，而非前引《四庫全書總目》所言元代馬端臨(1254-1323)的《文獻通考》。例如南宋尤袤(1127-1194)《遂初堂書目》首創將「章奏類」列於集部，之後陳振孫(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亦沿襲之；<sup>33</sup>鄭樵(1104-1162)《通志·藝文略》雖突破四部藩籬，但也在「文類」下，列有「奏議」的小類，<sup>34</sup>應該都與個人奏議集在宋代開始興盛有關。乾隆《四庫全書》之後，「詔令」與「奏議」改入「史部」，一般通論認為此番更動始於《四庫全書》的編纂，<sup>35</sup>但其實學者楊艷秋已經指出明代朱睦㮮(1520-1587)《萬卷堂書目》就已經將「奏議」劃分在「正史」、「編年」、「雜史」、「史評」、「起居注」等 13 類的史部之一；陳第(1541-1617)《世善堂藏書目錄》也在「史部」18 類中包含「詔令」與「奏議」。<sup>36</sup>此外，明朝徐圖等撰《行人司重刻書目》「史部」亦有「奏議」類，<sup>37</sup>明人王道明《笠澤堂書目》「史

<sup>33</sup>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79。林育慈，〈尤袤及其《遂初堂書目》研究〉(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80-83；何廣棧，《陳振孫之文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集錄考證》(中和：花木蘭出版社，2010)，頁 41-42。

<sup>34</sup> 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頁 162-169。

<sup>35</sup>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頁 79。

<sup>36</sup> 楊艷秋，〈明代目錄著作中的史部分類〉，《中國典籍與文化》，1(北京，2006)，頁 20-21。

<sup>37</sup> 徐圖等撰，《行人司重刻書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

評」之後也是「奏議」類，<sup>38</sup>可見明代「奏議」從「集部」到「史部」的鬆動。換個角度來看，明代其他書目的史部中亦有收入當代奏議集的例子，例如祁承燾(1563-1628)《澹生堂書目》的「史類」之「國朝史」內，就有何喬新(1427-1502)《勘處播州事蹟疏》、《平夏疏錄》、梅國楨(1542-1605)《梅衡湘征西奏議》等；<sup>39</sup>而《笠澤堂書目》的「雜史」也收有前引實為個人奏議集的秦金《安楚錄》等，<sup>40</sup>亦可窺知明代奏議集向「史部」趨近的傾向。

就文體來看，奏議既有文學內涵和針對政事的特殊內容，唐代史學家劉知幾(661-721)批評飾詞淫麗之風導致「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便成文集」，<sup>41</sup>但也可見奏議在分類上原可兼屬「史部」和「集部」；但自南宋以降，奏議在目錄類別裡長期劃屬「集部」，何以到了明代驟然出現「史部」的歸屬？上述個別明人書目更改南宋以來將「奏議」納入「集部」的具體原因雖難以得知，不過除《行人司重刻書目》僅列「前朝書疏」而因「便宜時變，條奏翩翩，諫行言聽，仰止先賢」將明代奏議收入「典故類」外，<sup>42</sup>其他分類變動的明代書目「奏議」類中，均列有相當比例的當代個人奏議集，提供了進一步思考的線索。例如《世善堂藏書目錄》「奏議」類所錄不多僅 28 本，

---

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 1939 年王大隆刊《己卯叢編》本影印)，頁 16b-17a。

38 王道明，《笠澤堂書目》，頁 36a-38a。

39 祁承燾，《澹生堂書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清光緒間會稽徐氏刊《紹興先正遺書》本影印)，卷 3，頁 9b-10a。

40 王道明，《笠澤堂書目》，頁 33a。

41 劉知幾，《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 5，〈載文〉，頁 92。

42 徐圖等撰，《行人司重刻書目》，頁 4a。

雖歷代奏疏和奏疏匯集較多，但收有 6 筆明代個人奏議集；<sup>43</sup>《笠澤堂書目》近五十條目中以 40 本的當代個人奏議集佔最大宗；<sup>44</sup>《萬卷堂書目》共收一百三十餘條，更是涵括明代個人奏議集近一百二十條。<sup>45</sup>這些書目中所佔比例驚人的明代個人奏議集除了反映其流行，深入來看其中標題從宋代以個人名號或官職等為主，到明代出現事件為中心來命名奏議集，如田世威《平虜疏議》、<sup>46</sup>章煥《平倭四疏》；<sup>47</sup>乃至題名完全不見奏疏字樣而難以得知其體裁的分類，如陳鈐《安邊錄》、<sup>48</sup>許論(1495-1566)《三捷錄》，<sup>49</sup>更是與如祁承燾《澹生堂書目》「國朝史」所收如孫允中(1506-1573)《雲中紀變》等明人野史筆記難以分辨，<sup>50</sup>揭示了奏議集在明代改入「史部」的緣由，和其不再僅強調個人政論文采或為官風範，轉而側重紀錄特定事件的作用不無關係。其中和邊疆戰事相關的主題尤多，如此奏疏結集後也就具有歷史文獻的性質，更成為個人奏議集改為「史部」的重要原因。前舉《澹

43 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清乾隆間長塘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影印)，卷下，頁 56a-57a。莊琳芳，〈陳第及其世善堂藏書〉(福州：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文獻學所碩士論文，2008)；吳清燕，〈明代福建私人藏書家陳第交遊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學所碩士論文，2015)。

44 楊艷秋，〈明代目錄著作中的史部分類〉，頁 20-21。

45 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卷 2，頁 5b-8a。

46 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卷 2，頁 5b；王道明，《笠澤堂書目》，頁 36a-38a。

47 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卷 2，頁 7a。

48 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卷 2，頁 7a。

49 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卷 2，頁 7a；王道明，《笠澤堂書目》，頁 36a-38a。

50 祁承燾，《澹生堂書目》，卷 3，頁 9b-10a。關於野史筆記的討論，參謝國楨，〈明清野史筆記概述〉，收入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 81-96。

生堂書目》所收當代奏議集便是集中在「國朝史」的「武功」類別之內，其他如「時務」類雖也有《河工諸議》，<sup>51</sup>但數目極少，也可推知明代個人奏議集與經武事件關連的發展特色。

從書目所見明代官員奏議集在數量和突顯邊務戰爭等的變化，也可以在其他材料見到。就個人奏議集的數目而言，各大圖書館目錄仍可見些許現存和重印者，如王崇古(1515-1588)《少保鑑川王公督府奏議》：「卷一至十一……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時所上奏疏……卷十二至十五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時所上奏疏」、<sup>52</sup>譚綸(1520-1577)《譚襄敏公奏議》：「〈閔稿〉……〈蜀稿〉……〈薊遼稿〉」、<sup>53</sup>高文薦(1527-1586)《經略三關奏議》、<sup>54</sup>孫承宗(1563-1638)《督師奏疏》：「督師榆關時奏疏」、<sup>55</sup>胡宗憲(1512-1565)《胡宗憲三巡奏議》、<sup>56</sup>《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影印如石茂華《毅庵總督陝西奏議》和《撫蜀奏議》及孫承宗《閱關奏稿》等。<sup>57</sup>若檢索明人文集，更會發現為數驚人的自

51 祁承燾，《澹生堂書目》，卷3，頁17a。

52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176。

53 譚綸，《譚襄敏公奏議》(收入姜亞沙、經莉、陳湛綺主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9，據萬曆二十八年宜黃知縣顧所有刊本影印)。

54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176-177。

55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178。

56 長澤規矩也，《三巡奏議》(東京：古典研究會，1964)；山根幸夫，〈三巡奏議と胡宗憲〉，收入山根幸夫，《明清史籍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9)，頁48-53。

57 石茂華，《毅庵總督陝西奏議》；徐元太，《撫蜀奏議》(收入姜亞沙、經莉、陳湛綺主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9，據萬曆十七年刊本影印)；孫承宗，《閱關奏稿》(收入姜亞沙、經莉、陳湛綺主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9，據明末刻本影印)。

序、他序或代序的奏議、奏疏、疏草、疏稿等序；其中標題在沿襲過去標示個人和官職之外，也可見前述標舉武功事件者，如〈胡公平寇奏議序〉、<sup>58</sup>〈太保邢公東征奏議序〉。<sup>59</su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即便以個人或官職為題的奏議集，也有了不同於宋代而越發強調邊疆戰事的發展。以個人為題的奏議集，出現不少武職者例如〈劉大將軍奏議序〉、<sup>60</sup>〈大司馬王公督撫奏議序〉、<sup>61</sup>〈兩督奏議序〉「大司馬虞坡楊公」、<sup>62</sup>〈栢泉胡公督撫奏議序〉「少司馬栢泉胡公」、<sup>63</sup>〈督府奏議序〉「司馬荊山王公」等。<sup>64</sup>官職標題者更出現了大量督撫邊疆者，序言也經常強調邊務和戰事的勝利，<sup>65</sup>例如〈防海撫畿奏疏序〉「外則奉倭虜之備」、<sup>66</sup>〈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都督雲中、

58 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5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264，頁7b。

59 李光元，《市南子》(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卷6，頁2b-6a。

60 倪元璐，《倪文貞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7，頁21a。

61 汪道昆，《太函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1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25，頁5b。

62 張袞，《張水南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影印)，卷5，頁20a。

63 尹臺，《洞麓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頁46a。

64 唐龍，《漁石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卷2，頁21a。

65 另外，亦有奏議集標題未特別表示邊務戰事，但序特別指出者；如吳善〈朱簡齋奏議序〉言「乃後先建白之疏，彙為編帙者。大都申飭章程、條陳時務，而其最著則在抗寇守邊，機宜百出而不窮也。」朱鑑，《朱簡齋奏議》(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重刊本)，上卷，〈序〉，頁4a。

66 顧起元，〈防海撫畿奏疏序〉，《懶真草堂集》(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

上谷諸鎮」、<sup>67</sup>〈大司徒張公撫遼奏議序〉「清河、劈山諸處，先後奏凱」、<sup>68</sup>〈雙谿陝西奏議序〉「六軍克捷」、<sup>69</sup>〈毅菴石先生總督陝西三邊奏議序〉「敘功奏凱」、<sup>70</sup>〈督府奏議序〉「三路捷奏」、<sup>71</sup>〈南贛督府奏議序〉「先後以捷聞」、<sup>72</sup>〈總制邊務奏議序〉「駿功茂烈，有平寇之碑」、<sup>73</sup>〈制府奏議序〉「總制陝西三邊軍務……胡戰弗克」、<sup>74</sup>〈督撫奏議序〉「公之撫閩……自公兵政成」、<sup>75</sup>〈栢泉胡公督撫奏議序〉「督撫我江西……麾兵大擊賊」等，<sup>76</sup>亦可見明代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盛行。

除了這些容易以關鍵字檢索的條目外，上述書目中標題已不見奏議字樣、而必須透過提要或閱覽全書才能確認是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者，更是散見於各式材料和圖書館收藏。例如前引《四庫全書

---

補編》，第 68-69 冊，明萬曆四十六年刊本影印；汪應蛟，《海防奏疏、撫畿奏疏、計部奏疏》（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刊本），另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8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67 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卷 334，頁 20b。

68 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卷 434，頁 11a。

69 崔銜，《洵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2，頁 62b。

70 劉伯燮，《鶴鳴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5 輯，第 2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萬曆十四年鄭懋洵刻本影印），卷 19，頁 4a。

71 唐龍，《漁石集》，卷 2，頁 21b。

72 汪道昆，《太函集》，卷 20，頁 17b。

73 王九思，《漢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嘉靖刻崇禎補修本影印），續集，卷中，頁 37a。

74 王維禎，《槐野先生存笥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4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影印），卷 2，頁 8a。

75 葉向高，《蒼霞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2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6，頁 64。

76 尹臺，《洞麓堂集》，卷 1，頁 46b-47a。

總目提要》「史部雜史」類的《平蠻錄》、《安楚錄》、《交黎撫剿事略》、《平夷功次錄》、《平播全書》；或其他文獻所載，如明人葉向高(1559-1627)文集《蒼霞草》所收〈平猺全書序〉：「嵩螺彭公按蜀時，征建南夷猺所為奏疏、文檄及諸尺牘，合而成編者也」，<sup>77</sup>以及程峒《壬午平海記》：「峒官蘇松兵備道時，曾剿平海，此當時往來書札檄揭」、張兆元《淮陰實紀》：「此書專輯其丞淮安時所上條議並公牘文」等，<sup>78</sup>三者均為個人奏議集，前兩者更和戰事有關。乃至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所藏雲南道監察御史董羽宸(1572-1648)《擇焉小草》卷1至卷8全為奏疏；姜良棟《鎮吳錄》冊1至2〈鎮吳錄〉收敕諭、奏疏、條議、條陳和詩文，冊3至4〈東征錄〉收姜良棟上級萬世德奏疏等，冊5〈西征錄〉則為7則兵部覆敘互市功疏略；林兆鼎(1570-1633)《威暨錄》：「茲威暨錄，是公心謀血戰之所積，自敘成書，其間臚列軍中十八年戰守機宜，條議井井、紀律森森」，在卷1〈平蘭紀〉和卷2〈臨銅紀〉，卷3和卷4為〈靜邊條議〉、〈征剿紅苗條議〉等條議，卷5為〈秉揭〉、〈履歷〉。此三書標題雖未明示，但應都可歸類為個人奏議集，後兩者更是與戰事相關，可想見還有更多材料在缺乏提要的輔佐下，只能暫時湮沒在書堆間而未能辨認；或也說明了明代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數目，實遠超過以往學界所知。

這些數量眾多的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可以說正如新近發現也在明代蔚為風潮的宦蹟圖和戰勳圖一樣，<sup>79</sup>均為當時自我並相互標榜個

77 葉向高，《蒼霞餘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2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6，頁8a。

78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144。

79 馬雅貞，〈戰勳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17(臺北，2011)，頁49-89。日譯見馬雅貞著，植松瑞希譯，〈戰

人為宦事蹟的官員文化之一環。兩者不論主題、文獻來源、生產機制等都類似，均是以士大夫為官經歷為中心的紀錄，士人的文集也記載大量相關的條目，後者的贊助人與前者的編纂者亦同樣有自己、<sup>80</sup>僚屬、<sup>81</sup>或門人子孫者，<sup>82</sup>可見都是廣泛流行於士人圈的文化現象。甚至有少數的例子更集合圖像與文書，共同來突顯個人的政績。例如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的《安南來威圖冊》，就是太平府知府江一桂的子孫，集合《安南來威圖》和《安南來威輯略》(內收投降本、敘功述等)，來突顯他招撫安南叛明的莫登庸(1483?-1541)之貢獻。<sup>83</sup>再如現存的秦金《安楚

勳と宦蹟——明代の戦争圖像と官員の視覚文化〉，23(東京，2013)，頁316-347；亦收入須田牧子編，《《倭寇圖卷》《抗倭圖卷》をよむ》(東京：勉誠出版，2016)，頁139-201。

80 如汪道昆(1525-1593)，〈大司馬王公督撫奏議序〉：「視師諸疏，公嘗梓之」，見汪道昆，《太函集》，卷25，頁8a。

81 如韓邦奇(1479-1556)，〈陝西奏議序〉：「吾陝藩臬諸公請刻」，見韓邦奇，《苑洛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頁19b。呂柟(1479-1542)，〈陝西奏議序〉：「有良司牧者，錄次成帙，爰加諸木」，見呂柟《涇野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1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據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于德昌刻本影印)，卷13，頁29b。唐龍(1477-1546)，〈督府奏議序〉：「彪列而刻之，以傳于世者誰氏，固原提兵副使澤山桑子溥是已」，見唐龍，《漁石集》，卷2，頁19a。王維楨(1507-1555)，〈制府奏議序〉：「中原州兵備副使滇南李君，乞集于先生所刻之，居無何，李君去，會東山紀君至，刻始竣事」，見王維楨，《槐野先生存笥稿》，卷2，頁8a。張袞(1487-1564)，〈兩督奏議序〉：「其督學山東門人高君某既詮次成帙」，見張袞，《張水南文集》，卷5，頁20。

82 如汪道昆，〈御史大夫思質王公奏議序〉：「二子次公奏議數十百篇」，見汪道昆，《太函集》，卷21，頁6a。

83 馮時暘、梁天錫、江美中輯撰，《安南來威圖冊》(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10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隆慶刻本影印)，頁373-479(此書因原版刻頁數混亂，故以影印本之新編頁數

錄》雖未見圖，但魯鐸(1458-1524)的序言提及「錄中為圖、為章疏、為檄令、為祭告之文，皆其設施功用之迹也」，<sup>84</sup>卷6 易舒誥(1475-1526)的〈總運戎機序〉則說「乃繪圖，貌公以在師，羅賢命將，選士出令之象，而書朝廷命征獎功敕詞其上，而屬誥序之」，<sup>85</sup>原書卷首之圖，或也可能和秦金的事蹟有關。而姜良棟《鎮吳錄》雖可能未刊圖，但孫有光詩序「將軍出郡人士所繪圖像、及縉紳所撰詩文以示」，<sup>86</sup>也可知戰勳圖和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可以分別、或同時以圖像和文本來表彰官員事蹟，兩者息息相關同為官員文化的一部分。

不過，相較於宦蹟圖和戰勳圖以繪畫為主而版刻者少，觀覽的對象有限，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則主要以文本出版傳布，流行之程度可能更甚之；再加上後者的文字表述更為直接，還可藉由收入其他內文等方式，成為後人表彰先世、甚至是官員間自我宣示的平臺。除了前述郭子章《黔中平播始末》：「以諸奏疏稍加詮次……以辨其誣」，<sup>87</sup>直接以奏議內容來與平話小說抗衡的例子外；<sup>88</sup>也有如〈少師夏公奏議序〉：「昔歐陽文忠，大不理口，而文章氣節，照耀古今。矧公所遭罹，無過纖芥，故辯誣諸疏，亦綴次末編，名為外集。將以表公隱微底裏，

---

注)。關於此書的討論，參注 79。又，白凱琳(Kathlene Baldanza)曾比對中越文獻(包括《安南來威圖冊》)對此事的不同記錄，參 Kathlene Baldanza, "The Ambiguous Border: Early Modern Sino-Viet Relations," (Ph.D. Dissert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0), Chapter Four.

<sup>84</sup> 秦金，《安楚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史部，第4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6，據明刻本影印)，魯鐸〈安楚錄序〉，頁2b。

<sup>85</sup> 易舒誥，〈總運戎機序〉，收入秦金，《安楚錄》，卷6，頁3a。

<sup>86</sup> 姜良棟，《鎮吳錄》(日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萬曆刊本)，詩文下，頁12b-13a。

<sup>87</sup>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54，頁485。

<sup>88</sup> 關於郭子章《黔中平播始末》針對平話「以辯其誣」的討論，參廖可斌，〈《征播奏捷傳》的成書方式和思想傾向〉，頁114-117。

咸可對人，而更涉艱危，不專順境也」，<sup>89</sup>另輯「辯誣諸疏」來發聲者。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請人所書的序言，當然更是充斥歌頌之音而不需在此贅述；有些序文則為作者辯護，如〈栢泉胡公督撫奏議序〉：

或言公議山西事，既不免忌者之構乃。頃在江西，亦有疑而訕  
 愬之者，於戲是惡，足識公皦皦無疵瑕之心哉。夫張忠定能使  
 蜀中百世思之，而不能使訛言一日之遂禁；范文正能致夏人小  
 大攝服，而不能致二府悅而諸將和，要其礪然著白於穹壤間。  
 公與宋二公行事無賢愚，皆可指見之爾。<sup>90</sup>

都可看到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除了結集相關文書外，還能夠透過各式編輯的手段，來達到作者或編者的特殊需求。

以下幾個特意編輯的例子，可以一窺明代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如何變形，而成為編者用以表述宣示的平臺。首先是前述《四庫全書總目》所收秦金《安楚錄》，其中一半內容「卷六至卷九為題贈詩文、卷十附錄封邱遺事」，包括來自 80 位中央與地方「同事者」書寫之卷 6 的 5 篇「敘碑文」、卷 7 的 29 首「詩詞」、卷 8 的 9 篇「歌頌賦」、卷 9 的 36 封「啟笥」、卷 10 的 7 篇關於封邱生祠的記賦等。這些錄集的「縉紳之頌揚、閭里之歌謠」數量很多，<sup>91</sup>直追官方文書的分量。大量的頌文看來或許喧賓奪主，但「所附錄同事者也，實同道也」，<sup>92</sup>展現的是官員圈的支持和讚揚。同樣的，姜良棟《鎮吳錄》冊 2 除數頁條議外，幾乎全為七十餘篇的頌揚詩文，有些篇章更是羅

<sup>89</sup> 田汝成，《田叔禾小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88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6，據明嘉靖四十二年刻本影印），卷 1，〈少師夏公奏議序〉，頁 20b。

<sup>90</sup> 尹臺，《洞麓堂集》，卷 1，頁 48。

<sup>91</sup> 胡俸，〈跋安楚錄後〉，收入秦金，《安楚錄》，後序，頁 6b。

<sup>92</sup> 魯鐸，〈安楚錄序〉，收入秦金，《安楚錄》，頁 3a。

列由近十位到數十名同僚「仝頓首拜贈」，<sup>93</sup>乃至最後為「吳民沈道淳等謠歌」，<sup>94</sup>洋洋灑灑地展示眾人對他的肯定。特別的是，冊 3 與冊 4〈東征錄〉還收錄姜良棟上級萬世德等奏疏，前有姜跋：

天子以疆場多事，下璽書總督萬公，令招延海內諸凡文武、罷閑將吏、布衣人等，但有奇謀善謀、奮勇立功者，俱得收用，棟趁此會……以有今日，良足厚幸。第<sup>95</sup>明以一言受知于叔向、夷吾，雖三北不棄于鮑子。棟非其人，然為棟叔向、鮑子者，不敢負也。遂作知遇錄一卷，圖諸公小像，各敘甄拔顛末，以識不忘。<sup>95</sup>

雖說是要不忘諸公對其的知遇之恩，但所收諸疏多半提及姜良棟的功績，和冊 5〈西征錄〉所錄兵部覆敘互市功疏略一樣，都有褒揚他人的同時也可以自褒的作用。至於前已提及的《安南來威圖冊》，除了圖文並刊的特殊剪裁外，其中文本《安南來威輯略》的編纂更不只是彙集如中卷和下卷的投降本、奏膚疏、敘功述、勅諭、謝恩本等環繞招撫莫登庸的官方文件，或平南饒歌曲、南征奏捷詞、征南碑文、昭德碑文等歌頌的詩文而已。上卷全以江一桂的行狀、墓誌銘等傳記為中心，大大地聚焦在他個人的行誼。下卷甚至還在部分文書後加入「附見」的評論，評議如〈究奸正法申〉後：

右申本為究奸細以明心跡，正國法以信外夷事也。而單騎奉辭，錯錯具見焉……八年之擾，獨賴有此，而唯此申見之，公論安在，嗚呼悲夫。又，第觀就裡，使無此申，則咸寧之邀功……

<sup>93</sup> 姜良棟，《鎮吳錄》，第 2 冊，〈鎮吳錄〉，詩文下，頁 33b-39b、43b-46b。

<sup>94</sup> 姜良棟，《鎮吳錄》，第 2 冊，〈鎮吳錄〉，詩文，頁 47。

<sup>95</sup> 姜良棟，《鎮吳錄》，第 3 冊，〈東征錄〉，無頁碼。

即今受降昭德，煥乎巍然者，在當時亦賴有此焉。<sup>96</sup>

或〈委官太平府建議規制回文〉：「今稽其事，考其時，皆當，當事論功。陞任既去之餘，敘功殿，最為抱不平」，<sup>97</sup>加強提點編者對其事蹟的意見。而沈正宗《禦寇急務》初集和續集均偶有評點，如「賊非難剿，觀剿賊之兵將，而知其難。余往年見始知終故，不幸言而終」等。<sup>98</sup>這幾個例子固然特殊，<sup>99</sup>但也可見明朝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已不只是單純的奏疏合集，而成為表述官員事蹟的管道之一。

### 三、康熙時期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發展——以姚啟聖《閩頌彙編》與施琅《靖海紀事》為例<sup>100</sup>

明代這股編纂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潮流，也類似明清戰勳圖的發展，一直延續到康熙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勢。<sup>101</sup>首先，兩者紀念的對象既有漢人官員如楊捷《平閩記》，也擴及滿洲旗人如鄂海《撫苗錄》。<sup>102</sup>再者，清代戰勳圖和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內各式表述方法的規

<sup>96</sup> 馮時暘、梁天錫、江美中輯撰，《安南來威圖冊》，頁 454。

<sup>97</sup> 馮時暘、梁天錫、江美中輯撰，《安南來威圖冊》，頁 472。

<sup>98</sup> 沈正宗，《禦寇急務續集》（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刊本），頁 1a、5b。

<sup>99</sup> 但可能也非特例，例如《四庫全書總目》浙江版對於周起元(1571-1626)《忠愍奏疏》的解題，就提及「後又錄諸人題贈詩詞」。昌彼得，〈跋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入昌彼得，《增訂蟬庵群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出版公司，1997），頁 109-110。

<sup>100</sup> 此節英文版參 Ya-chen Ma, "To Visualize or Not to Visualize: Commemorating the Suppression of Revolt in Early Qing China," in *Iconic Revolts: Political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Imagery*, edited by Monika Renate Barget, David de Boer and Malte Griesse, forthcoming.

<sup>101</sup> 關於明清個人戰勳圖的發展，參馬雅貞，《刻畫戰勳》。

<sup>102</sup> 鄂海、車鼎晉編，《紅苗歸化恭紀詩·紅苗歸化恭紀詩跋》。又，鄂海、

模，也有越加擴大的傾向。以序跋而言，篇幅經常很長或數量頗多，如佟國器在《三撫密奏疏稿》和《三撫捷功奏疏》前的洋灑自序、<sup>103</sup>萬正色《平岳疏議》有五篇序跋，<sup>104</sup>而楊捷《平閩記》：「序跋之屬，已有三冊，純為歌功頌德之作」更是數量驚人。<sup>105</sup>就題贈詩文來說，《撫苗錄》第七、八冊全為紅苗歸化恭紀詩與跋文；<sup>106</sup>姚啟聖(1624-1683)以奏疏和文告為核心編纂的 20 冊《閩頌彙編》，不論標題或近一半達九冊的歌頌之詞，都更為強調閩人對其之頌揚。<sup>107</sup>從評論來看，夏駟《交山平寇本末》：

紀交城知縣趙吉士剿賊事……駟時客吉士幕中，因紀其本末……松江陸慶臻為之評點，並附賀贈詩篇於後。餘姚邵以發復取吉士詳文、書牘有關平寇者，別為二帙，評論而刊之。<sup>108</sup>

比明代《安南來威輯略》僅在部分文書後加上「附見」或《禦寇急務》偶有評點都來的全面；而前述施琅《靖海紀事》在每則奏議後均「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稱頌的作法，<sup>109</sup>更是明確宣示獲得地方菁英的支持。這些例子都顯示清代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以序、題贈詩文、

車鼎晉編，《撫苗錄》。

<sup>103</sup> 佟國器，《三撫密奏疏稿 三撫捷功奏疏》(收入經莉、陳湛綺主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

<sup>104</sup> 萬正色，《平岳疏議》(國立臺灣圖書館藏，康熙二十一年序刻本)。

<sup>105</sup>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632。

<sup>106</sup> 鄂海、車鼎晉編，《紅苗歸化恭紀詩·紅苗歸化恭紀詩跋》。

<sup>107</sup> 佚名編，《閩頌彙編》(收入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 2 輯，第 1-7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陳支平即指出《閩頌彙編》共列歌頌者達八百餘人，參陳支平，〈《閩頌彙編》與姚啟聖生前身後事〉，《東南學術》，1(福建，2015)，頁 229-238。關於《閩頌彙編》的討論，詳見下文。

<sup>108</sup>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54，頁 490。

<sup>109</sup> 施琅，《靖海紀事》。

評論等方式來表彰官員的趨勢愈發盛大。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姚啟聖《閩頌彙編》和施琅《靖海紀事》的編輯策略和政治脈絡，更可以看到康熙朝官員的戰勳圖像與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不僅用來表彰官員，還升溫成兩方角力的平臺。<sup>110</sup>先就姚啟聖而言，他十分熱衷於製作轟轟烈烈的戰勳圖和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除了卷帙浩大的《閩頌彙編》，還贊助紀念其上司康親王傑書(1645-1697)平定三藩的大功圖屏障，以及數量和尺寸驚人的 50 幅高 32 公分寬 64 公分、並有 50 張相應由 50 人題跋的《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版畫。<sup>111</sup>姚啟聖之所以贊助傑書的戰勳圖像，和他政治生涯與傑書平定三藩的進程密切相關，而與上述姜良棟《鎮吳錄》的〈東征錄〉收錄上級萬世德等奏疏類似，都是在褒揚上司的同時也自我表揚。自康

110 郭子章《黔中平播始末》雖針對平話「以辯其誣」，但其以按奏疏詮次的紀事本末史來與小說對抗，尚非以個人奏議集作為平臺互相角力。

111 雖然《禮府家傳》言：「[康親]王因奉命奏凱，閩省人民因感悅膚功，繪大功圖為屏帳，都為一冊。兵相傳誦，耆儒名士咸作詩賦，以頌揚功德」，但下文提及姚啟聖《閩頌彙編》的「平海圖」中有十餘圖和《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雷同(詳見注 114)；且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有簽題：「此大功圖係姚啟聖紀功之圖，今南征圖系先王爺紀年之意，兩圖題目不合，詩句各殊。本冊內僅選二十幅，詩頌可用，餘皆不合」，應是永恩(1728-1805)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復號禮親王後，蒐集先祖事蹟來編刊《南征圖詩草》時所題，或可藉而推測大功圖屏障和《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的製作都與姚啟聖有關。關於《南征圖詩草》的紀錄，見丁丙藏，丁仁編，《八千卷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2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民國十二年錢塘丁氏鉛印本影印)，卷 19，頁 374；德坤，《禮府家傳》(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第 33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3，據清乾隆四十三年刻本影印)，頁 621-648、641；永恩，《誠正堂稿》(收入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6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乾隆刻本影印)，頁 79-273。

熙十三年(1674)清聖祖派傑書率師討伐耿精忠，姚啟聖便捐資募兵到傑書軍前請求效力，隨著征戰的接連成功他很快地一路擢升，從隨征同知、浙江溫處道等到康熙十五年(1676)底升為福建布政使，康熙十七年(1678)更成為福建總督。<sup>112</sup>因此《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所描繪的事件不僅標舉傑書的勝戰歷程，也註記了姚啟聖對平定戰事的貢獻，50幅中就有近半的標題提及姚啟聖。<sup>113</sup>之後紀念他自己於福建功績的

112 關於姚啟聖和施琅功過的評述很多，不過本文無意臧否歷史人物，而以其生平贊助戰動圖像或出版戰事相關奏議集的討論為主。姚啟聖的生涯，主要參照陳芹芳，〈姚啟聖與閩臺社會〉(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專門史所碩士論文，2004)所輯的年譜，頁53-66。施琅的事蹟則參考施偉青編，《施琅年譜》(長沙：湖南嶽麓出版社，1998)。

113 除了注114所列之外，《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尚有以下各圖標題有姚啟聖者：第四圖《康親王命副都統馬哈達、援勦總兵李榮、溫處總兵陳世凱、隨征同知姚啟聖，大破偽都督徐尚朝于知道山，恢復武義、義烏各縣圖》、第五圖《康親王命夸蘭大、白色蘇、金華副將牟大寅、撫標遊擊田萬侯、隨征同知姚啟聖，各統標兵三路進攻，大破偽都督朱德甫於紫閣山，恢復諸暨、浦江各縣，并同知姚啟聖陣斬朱德甫圖》、第九圖《康親王命隨征同知姚啟聖，留兵四百名，鎮守諸暨縣。偽都督王山、偽總兵楊芬生、盧楚佩等，趁虛率偽兵三萬七千餘名，五路侵犯。姚啟聖孤軍力戰，大破賊兵于楓橋，蕩平諸暨、會稽、新嵎各縣山賊，及招撫偽都督、偽總兵等全師歸順圖》、第十圖《康親王統領大兵前赴金華府，命都統馬哈達、總兵李榮、陳世凱、同知陞溫處道姚啟聖，攻取桃花嶺，大敗賊兵，恢復永康、縉雲各縣，併處州府圖》、第十一圖《康親王命都統馬哈達、總兵陳世凱、溫處道姚啟聖，鎮守處州，大破偽都尉連登雲、偽都督馬騰龍、徐尚朝，於陳壇頭圖》、第十六圖《康親王命貝子固山、副都統吳申、溫州鎮陳世凱、平陽鎮王廷梅、溫處道姚啟聖，領大兵由間道進攻石塘，大破偽都尉連登雲圖》、第十八圖《康親王命貝子固山、及溫平兩鎮溫處道姚啟聖，克復石塘、并松陽等五縣，大獲全勝士民壺漿勞師圖》、第二十九圖《康親王命布政司姚啟聖，統福州城守副將趙得壽，帶領官兵從間道救援漳州，敗劉國軒于碧湖，追至象鼻山，大獲全勝圖》、第三十二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駐劄鳳凰山，招撫海賊，捐貲給賞，投誠賊眾相率歸

《閩頌匯編》中 16 幅的「平海圖」，更有 13 幅來自《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sup>114</sup>也可見姚啟聖與傑書勳蹟的重疊。大功圖屏障的展示

順圖》、第三十三圖《康親王命平南將軍賴塔、總督姚啟聖，鎮守漳州，大敗偽帥劉國軒，于蜈蚣山、龍虎山，恢復長泰、同安各縣圖》、第三十四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恢復漳平縣，招撫偽總兵黃瑞鑣等，投誠歸順圖》、第四十一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先復十九寨，乘勝恢復海澄圖》、第四十二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恢復廈門、金門圖》。

- 114 「平海圖」第二圖《招撫韓大任》、第一圖《招撫劉進忠》、第三圖《剗營鳳凰山洪塘與灣腰樹觀音山對壘》、第四圖《設站運米》、第五圖《北溪龍虎山大捷》、第六圖《招撫廖瑛等五大鎮》、第七圖《文圃山大捷》、第八圖《攻打洪礁剗營王家城漸山寨》、第十圖《克復觀音山、三叉河等處》、第九圖《招撫武平將軍》、第十一圖《蕩平廈門》、第十二圖《招撫朱將軍》、第十三圖《請旨復界安插授誠》，與《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第二十六圖《康親王命布政司姚啟聖，招撫盤踞江西吉安府，偽將軍韓大任等於汀州府，共計官兵一萬七千餘帶赴軍前，江西蕩平，百姓復業圖》、第二十八圖《康親王命布政司姚啟聖、中書郭洪，前往廣東，招撫劉進忠，恢復惠潮二府，各縣歸順，廣東通省蕩平圖》、第三十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同平南將軍提督，鎮守漳州，駐剗鳳凰山、洪塘、灣腰樹、觀音山，與賊對壘鏖戰圖》、第三十一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鎮守漳州，設運站米，接濟兵食圖》、第三十三圖《康親王命平南將軍賴塔、總督姚啟聖，鎮守漳州，大敗偽帥劉國軒，于蜈蚣山、龍虎山，恢復長泰、同安各縣圖》、第三十六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招撫廖典等五大鎮來歸，偽帥劉國軒失勢，恢復平和縣圖》、第三十七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鎮守漳州，大破偽帥劉國軒等，戰克文圃山，復取江東橋圖》、第三十八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鎮守漳州，進攻洪礁，駐剗王家城漸山寨圖》、第四十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大敗劉國軒，克復觀音山、灣腰樹、三叉河、玉洲、石碼等十九寨圖》、第四十三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招撫偽武平將軍陳昌等，帶領戰船二百餘號，率眾歸附圖》、第四十四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蕩平廈門、金門，禁擄掠子女、玉帛，出示安民，老幼簞食壺漿迎師圖》、第四十六圖《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招撫偽總督將軍朱天貴等，帶領戰船三百餘號，傾心來歸圖》、第四十九圖《康親王諭將軍、督撫、提鎮，既破鄭賊，恢復各島，急宜招集離散，安插新附，會議戰守要略、防汛機宜、用保久安長治圖》，圖的標題和構圖等極為相關。

性質和《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版畫和題跋的傳播作用，都可見姚啟聖對戰勳圖像與題頌文字所能發揮的公開作用十分有興趣。

《閩頌匯編》中 9 冊一千餘首福建各縣士民的頌詞，尤其展現姚啟聖了對公眾支持的徵求。這些數量龐大的詩賦不僅用以見證姚啟聖對福建的功德，更呈現地方人民對其貢獻的背書，對於一位才剛喪失與施琅一同進剿臺灣以安定閩臺的福建總督而言，<sup>115</sup>一定更有宣示和撫慰的作用。特別是原為鄭芝龍(1604-1661)部將的施琅在姚啟聖數度保舉後獲得康熙進用，<sup>116</sup>卻一再向康熙上疏要求專征鄭克塽(1670-1707)而不願與姚啟聖共同征臺，康熙二十一年(1682)施琅終於得到專征授權，隔年於澎湖海戰大勝，八月封靖海侯；<sup>117</sup>相對地，身為福建總督的姚啟聖非但喪失征伐指揮權而只能協助後勤，但康熙於他卻是「賞不及」。<sup>118</sup>兩人遭遇如此不同，莫怪乎姚啟聖倍感不平。或許這也是為什麼雖然姚啟聖未出征臺灣，《閩頌匯編》第一組插圖卻以「平海圖」為名，在描繪其於傑書督軍下平定福建的十餘個主要戰勳後，特別加上「出師定海圍頭銅山」的海軍陣仗，並以「平海凱旋」總結，<sup>119</sup>不無與施琅「靖海」之功相抗衡的意味。施琅封侯兩個月後，「全閩士農工商鼎建」了「總督福建少保兵部尚書姚公再造全閩鴻功碑」，<sup>120</sup>很可能就是為了在這種尷尬的時機突顯姚啟聖備受人民愛戴。同樣的，《閩頌匯編》所刊

---

「平海圖」第十四圖《禡師犒賞》右半構圖和《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第四十九圖近似。

115 陳芹芳，〈姚啟聖與閩臺社會〉，頁 39-42。

116 陳芹芳，〈姚啟聖與閩臺社會〉，頁 36-39。

117 施偉青編，《施琅年譜》，頁 476。

118 陳芹芳，〈姚啟聖與閩臺社會〉，頁 66。

119 佚名編，《閩頌彙編》，頁 33-65。(此影印之原書不見頁碼，故以下均為現代新標頁碼。)

120 佚名編，《閩頌彙編》，頁 19-31。

其奏疏，也是「閩中子民錄」，<sup>121</sup>應該也具有同樣的作用。《閩頌匯編》還附有「全省子民痛哭總督大老爺姚恩德述略」，<sup>122</sup>同樣強調福建所有人民的支持。不過從全書序文和頌詞都未提及姚啟聖過世來看，應該均為他生前所徵集，此書很可能是在他突然逝世後出版，而應視之為姚啟聖主導下訴諸民意的出版。<sup>123</sup>

《閩頌匯編》的兩組插圖，同樣可見尋求公眾擁護的策略。第一組「平海圖」共 16 幅，雖然 13 幅來自《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但大幅降低了對清軍征戰場景的比例。其中以姚啟聖和平的軍事策略為主，包括「設站運米」和近三分之一的招撫事件，以及有益民生的「請旨復界安插投誠」，以及描繪人民擁戴的「蕩平廈門」等。<sup>124</sup>第二組「長樂福清貳縣展界圖」更是強調姚啟聖治理閩省的政績和人民的感謝，共有「歡呼展界」、「遠近籲謝」、「捐給牛種」、「襁負還鄉」、「歸認廬墓」、「架屋墾田」、「秋成樂業」、「感恩崇報」。<sup>125</sup>合而觀之，兩組插圖凸顯了姚啟聖的武功文治對福建人民的貢獻。

簡言之，姚啟聖的系列圖像與文字紀述均訴求公眾的支持，很可能和其與施琅的競爭有關。尤其原為鄭氏屬下的施琅若非姚啟聖等的保舉，應是很難獲得康熙信任的，而施琅最後獲得專征權並獲封靖海侯，對作為福建總督的姚啟聖而言一定格外憤懣；更不要說姚啟聖對施琅攻臺的後勤支援完全不受到康熙皇帝的肯定。想來《閩頌匯編》

121 佚名編，《閩頌彙編》，頁 117。

122 佚名編，《閩頌彙編》，頁 85-107。

123 儘管陳支平指出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尚未平復臺灣前，姚啟聖曾發過「申禁刻謠立碑」的文告，禁止紳士庶民歌功頌德，但他也懷疑《閩頌彙編》是姚啟聖「暗中默許，甚至背後指使的嫌疑」。陳支平，〈《閩頌彙編》與姚啟聖生前身後事〉，頁 233-234、238。

124 佚名編，《閩頌彙編》，頁 33-65。並參注 114。

125 佚名編，《閩頌彙編》，頁 67-99。

中千餘首的士民頌辭，對姚啟聖來說既是證明也是慰勉其功績。不過他終究還是氣憤難消，施琅封侯後三個月他就過世了。

姚啟聖的競爭者施琅，也出版了其奏疏等來紀念其平定臺灣的勳蹟。現存的版本《靖海紀事》為手抄本，<sup>126</sup>但留存的幾篇序言顯示最早編纂為《平南紀詠》，是在施琅封侯返回福建後出版，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天加上其奏疏，出版為或名《平南奏疏》、《平南事實》、《平南實績》、《平南表章》、《平海奏疏》的奏議集；康熙四十八年(1709)施琅二子加上御製詩章等合刻為《靖海紀》；現存抄本則是依據十九世紀重刊本《靖海紀事》抄錄，包含未紀年的鄭開極(1638-1717)〈平南行〉、周澎百〈平南賦〉、陳遷鶴贊，康熙二十四年的5篇序文，以及施琅奏疏等，應該保留了施琅在世期間出版的《平南奏疏》大部分的文本。<sup>127</sup>由於現代重印本均以《靖海紀事》稱之，本文除特別需要，以下亦以《靖海紀事》通稱。

雖然以奏疏為主體的施琅《靖海紀事》和姚啟聖《閩頌匯編》都是個人奏議集風潮下的產物，但施琅《靖海紀事》出版的時間點就在《閩

<sup>126</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101。另外，施琅撰，施士駿輯，《平海奏疏總錄》(收入姜亞沙、經莉、陳湛綺主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0，據清抄本影印)與《靖海紀事》上卷近似，僅略有不同。

<sup>127</sup> 從現存資料，難以判斷施琅奏議集的確切名稱，鄭開極〈平南行〉稱《平南奏疏》，富鴻基(1634-1708)序言《平南事實》，林麟焜為《平南實績》，程甲化序稱《平南表章》，施世駿(1667-1714)則言《平海奏疏》。另外，《平南紀詠》的刊刻時間究竟是二十二年或二十三年所作，也無法確定。康熙二十四年(1685)林麟焜序言：「客歲冊封旋里，莆先生暨士民以《平南紀詠》問序於麟焜，既序而刻之；今年春，合閩之諸先生都人士復以《平南實績》命麟焜序之」，提及《平南紀詠》為「客歲」康熙二十三年所作；然而施琅「冊封旋里」的時間是康熙二十二年。施琅，《靖海紀事》，頁99-101。

頌匯編》後不久，其以頌詞和奏疏為主的內容，以及同樣訴求公開支持的編輯策略，很可能是回應《閩頌匯編》。<sup>128</sup>姚啟聖《閩頌匯編》奏疏為「閩中子民錄」，施琅《靖海紀事》的序言也說「閩之人取公前後章疏，彙萃編刻」。<sup>129</sup>如果《閩頌匯編》9冊所錄福建士民頌詞為的是證明地方對姚啟聖的擁戴，施琅一樣也訴求來自民意的支持。

然而，相對於姚啟聖《閩頌匯編》泛稱的「閩中子民」，施琅《靖海紀事》則更為強調來自地方菁英的支持。施琅的每篇奏疏後，如前述都附有「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sup>130</sup>現存的兩篇頌文其一是知名的文士鄭開極所作，另一位則是自稱「門下士」的周澎。<sup>131</sup>如果《閩頌匯編》仰賴大量的頌辭來見證大眾對姚啟聖的支持，施琅憑藉的則是地方菁英對其作為的權威背書。雖然無法完全確認現存抄本是否保留了所有的頌文，但原來的數量應該有限而不像《閩頌匯編》那樣誇張。現在留存的唯二兩篇都來自士人也許就是原貌，又或者至少也是後來編輯者選擇只保留文士篇章的結果。無論如何，士人在晚期中國社會價值體系居高的位階，不難解釋為何對施琅而言幾篇精英文士的

<sup>128</sup> 相對的，施琅征臺的副將吳英(1637-1712)就未選擇奏議集的方式，而是採自傳體例的《行間紀遇》來記述自己的動蹟。雖然《行間紀遇》可能也參考其奏議來撰寫，但並未以奏議集的模式來和施琅或姚啟聖爭勝；從吳英對施琅專征和施姚兩人之間矛盾的描述，如「英見督(姚啟聖總督)、提(施琅提督)未甚和睦，不敢許」、「英曰……願公傾心降氣，與總督和睦」等，也可見他顯示出周旋於施姚間的和平立場，或亦可作為施姚均刻意以奏議集作為兩人自我表達的平臺之旁證。吳英撰，李祖基點校，《行間紀遇·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頁61。感謝黃宥惟提供吳英《行間紀遇》的訊息。

<sup>129</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3、7、11。

<sup>130</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4、8-9、12、17、19-21、24、26、37、42、45-46、48、50、53、62-63、65-66、69。

<sup>131</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17、21。

頌文，未嘗不無與《閩頌匯編》量泛頌辭相抗衡的作用。

施琅奏疏後的「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尤其顯示《靖海紀事》回應《閩頌匯編》的編輯策略。與姚啟聖大量徵集而來的千餘首個人頌詞相反，《靖海紀事》的這些附錄以「八閩紳士公刊原評」為名，宣稱是代表福建八縣所有菁英的共同客觀意見(但其中完全未列出「八閩紳士」的姓名或人數)；雖然細讀之與其說是評論，其實更像是為稱讚施琅品德、能力與功績的頌文。其中幾篇甚至針對施琅和姚啟聖的競爭為前者辯護，例如在施琅〈密陳專征疏〉後的「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云：「古大將出師，未有貳其權而可以有成者也……公推誠布公，汲引奇才，為貳為副，皆稱厥職，此其闊達大度固已過人遠矣。」<sup>132</sup>或是〈飛報大捷疏〉後大力稱讚「閱此疏始末，纍纍幾萬言，既詳悉，又暢達，既真實，又明淨。宣公以下，莫能加焉。公洵文武全才哉！」之後突然話鋒一轉以「閩人即禿毫贊述，又何能揄揚公之萬一哉」總結，<sup>133</sup>彷彿是對《閩頌匯編》中連篇頌贊姚啟聖的反諷。施琅《靖海紀事》獨創的「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可以說是藉由聯合地方菁英客觀公正的評論，來對比《閩頌匯編》無數對姚啟聖的個人、主觀、奉承之頌詞。

然而不論是《閩頌匯編》的連篇頌文，或是《靖海紀事》的「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其實都是在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原型上加以變化，再加以調整來互相角力。《靖海紀事》雖然是將先刊行的《平南紀詠》再加上施琅奏疏後改名的結果，但奏疏的比重最大，後續的版本也因襲之，還是屬於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體式。而《閩頌匯編》共 20 冊，首冊(版心「閩頌匯編」)有前述「總督福建少保兵部尚書姚公再

<sup>132</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 12。

<sup>133</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 37。

造全閩鴻功碑」、「平海圖」、「長樂福清貳縣展界圖」、述略等，接下來的 10 冊為姚啟聖奏疏等(版心「憂畏軒奏疏」)，最後 9 冊為頌詞(版心「閩頌匯編」)；也是以奏疏為核心，加上前相關傳略、後頌文的結果。從上海圖書館另藏有《總督福建少保兵部尚書姚公奏疏》(版心「憂畏軒奏疏」)，與同館藏《閩頌匯編》中 10 冊的姚啟聖奏疏同版來看，亦可以確認《閩頌匯編》是從奏議集發展而來的出版。但是《閩頌匯編》不只在首冊加入標榜姚啟聖功勳的宦蹟圖與戰勳圖，還加上了比重與奏疏幾近相當的 9 冊頌文，乃至於從《總督福建少保兵部尚書姚公奏疏》更名為《閩頌匯編》，使之與奏議集看似相差甚遠，更改變了原來個人奏議集所具有的歷史檔案性質，而轉為姚啟聖功績的證明。同樣的，《靖海紀事》每篇奏疏之後的「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也讓施琅的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成為與姚啟聖和《閩頌匯編》較勁的場域。

如此來看，施琅《靖海紀事》沒有附圖的作法，容或也是對姚啟聖大量運用圖像來表彰個人勳蹟的回應。雖然無法完全確定最初《平南奏疏》的原貌，但 5 篇序言均未談及圖像；再考慮這些序言一再地述及「鄉先生士民以平南事實相示」、「莆先生暨士民以平南紀詠問序……合閩之諸先生都人士復以平南實績郵筒」，<sup>134</sup>這些書序者應該也知曉此書訴求公眾支持的策略故也加以強調，倘若圖像是《靖海紀事》很重要的一部分，容或亦會有所說明，因此很可能原來的版本就沒有插圖。如同施琅以客觀公正的「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來回應姚啟聖的大量頌文，《靖海紀事》不繪製標舉個人勳蹟的圖像可能也有相似的作用。《靖海紀事》透過回歸奏議集羅列奏疏、僅有文字而無圖像的方式，更是突顯出和姚啟聖贊助大功圖屏障、《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版畫、以及《閩頌匯編》「平海圖」和「長樂福清貳縣

<sup>134</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 37。

展界圖」等大批圖像來宣揚個人功勳的對比，莫怪乎諸序中稱其「平南事實」、「平南實績」，強調的都是其客觀的平實記述。施琅子孫後來編輯的《靖海紀》雖然將名稱改為帶有歷史敘事的意味，但也僅增列檔案性質的御製文等文本，沿襲一般沒有圖像而僅有文字的奏議集體式。

姚啟聖《閩頌匯編》的大量圖繪和巨帙頌文，對照施琅《靖海紀事》選擇性地對奏議集之體式的更動與回歸，顯示個人戰事奏集自明代發展到康熙朝，變異度更高且承載的意涵也越發豐富。施琅《靖海紀事》既藉「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來回應姚啟聖《閩頌匯編》的巨帙頌文，也捨棄後者重度使用的圖像，而以奏疏文本對比出其羅列檔案事實的客觀性。雖然此節以康熙中期的姚啟聖和施琅為例，但前已述及這股刊刻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風潮並不限於漢人，滿洲旗人如鄂海也印行了包含館臣〈紅苗歸化恭紀詩〉的《撫苗錄》。<sup>135</sup>總的來看，清代流行的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既是承繼明代作為表彰官員的平臺和記述時事的歷史文本，更成為官員間對話的文化場域，其獨特匯集官方文書的體裁而具有檔案權威性的特質亦被突顯，莫怪乎其變化較之明代愈發踵事增華，盛行的程度亦過之而無不及。

#### 四、康熙宮廷對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收編與皇權轉化

在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對明清士人具有多元而重要文化意義的基礎上，吾人可以進一步思索其與方略的關係。本文前言已述及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和清代方略體裁的相近，若再從明朝到康熙時期個人

<sup>135</sup> 鄂海、車鼎晉編，《紅苗歸化恭紀詩·紅苗歸化恭紀詩跋》。鄂海、車鼎晉編，《撫苗錄》。

戰事相關奏議集已然是官員盛行的文化一環來思考，康熙宮廷針對特定戰爭、依照時間順序先後、將上諭等宮廷檔案編纂而成的方略，不無可能也是轉化士大夫主流文化而來。尤其相對於歷代宮廷藝文以承襲過去皇權傳統為主、但未必熱切或全面認同文士文化的態度來看，康熙朝開始不論是提倡當時流行於文人間的董其昌(1555-1636)畫風而成正統畫派、<sup>136</sup>康熙帝模仿董其昌書風並大量頒賜御書、<sup>137</sup>轉化明清士人的園林圖畫建立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御製避暑山莊詩》、<sup>138</sup>以及收編明清以來官員圈盛行的宦蹟圖而為如《南巡圖》等用以記錄皇帝政蹟的官方圖繪，清宮收編主流士大夫文化的積極與規模，乃昔所未見，而可說是滿洲皇帝致力建構的「文化霸權」。<sup>139</sup>「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原係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7-1937)用來討論資本主義制度下文化與權力的關係，涉及支配群體如何透過文化象徵等作用，促使被支配者默認接受其從屬地位；<sup>140</sup>但對歷史學的分析也能有所啟發。<sup>141</sup>特別

<sup>136</sup> Wai-kam Ho and Judith G. Smith eds.,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 (Kansas City, Missouri: Nelson-Aktins Museum of Art, 1992); 黃瑋鈴，〈畫圖留與人看——由王原祁的仕途與畫業看清初宮廷山水畫風的奠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sup>137</sup> Jonathan Hay, "The Kangxi Emperor's Brush-Traces: Calligraphy, Writing, and the Art of Imperial Authority,"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edited by Wu Hung and Katherine Tsiang Mino, 1-4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4).

<sup>138</sup> 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故宮學術季刊》，32：2(臺北，2014.12)，頁39-80。

<sup>139</sup> 馬雅貞，〈刻畫戰動〉。

<sup>140</sup> Antonio Gramsci, translated by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12.

<sup>141</sup> T. J. Jackson Lear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gemony: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3 (June 1985): 567-593.

是統治者如何贏得被支配者對既有社會秩序的共識、如何持續地創造其合法性以維持其支配地位，被支配者又如何參與此合法化其被支配的共謀之中，以及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文化並非界線分明而是可穿透的等概念，更有助於思考滿洲支配群體藉由收編中國既有社會價值體系中層級居高的文士文化，贏得被支配漢人對原來社會的共識；經其轉化為各式「御製」、「欽定」宮廷文化，加強以士大夫為首的被支配漢人之從屬定位，更強化了皇權在中國本土(China proper)社會秩序中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些清宮文化需要滿洲皇帝一再接續展演以維持其支配地位；而正是被支配漢人菁英的參與，例如編纂收編自士人園林文化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為轉化自戰勳圖等官員視覺文化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題跋稱頌等，才讓其被支配合法化的共謀得以維繫。儘管沒有盛清皇帝如何與其臣下討論為何轉化主流士大夫文化、或是士人直接回應滿洲皇權收編的史料存在，但是綜觀上述正統山水畫收編自董其昌畫風、皇苑圖繪轉化自明清士人園林圖、《南巡圖》轉化自官員宦蹟圖、《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轉化自官員戰勳圖等幾個例子，都可以推測出類似的模式：可能都是從在首都圈的朝廷高官基於己身熟悉的士大夫文化，推薦上述文化事業的進行，皇帝同意後與這些大臣共同討論出轉化的方式(具體或許是大臣揣測上意先行試作，最後再由皇帝定奪)，<sup>142</sup>完成後透過刻版印刷、賞賜給個人、分發或間接贈予至官衙或書院寺廟等、甚至口傳的方式傳佈到其他層級、地區

<sup>142</sup> 感謝匿名審查人建議考慮高士奇(1644-1703)所刊《扈從東巡日錄》的例子。此書收錄他記錄康熙東巡盛京的詩文，以及其他文士題贈的詩句，將東巡展現成如詩般的行旅、康熙帝為文采敏捷的君主、以及聖京如文明久駐的鎬京和長安。雖然此書並非康熙宮廷的刊本，而不能直接作為此處揣測皇權從首都圈朝廷高官開始展開收編士大夫文化模式的例子，但或不無作為康熙宮廷後來編纂《幸魯盛典》引子的可能性，至少也可視為士大夫對清宮拉抬皇權的主動呼應。

的官員和士人間。從清帝國皇帝的角度來看，<sup>143</sup>滿洲作為統治漢人社會的少數族群，除了繼承原來漢人皇帝透過皇室收藏、祥瑞圖像等宣示王朝天命的作法外，收編原屬漢人菁英的文化，毋寧是建立滿洲皇權相當有效的方式；而清宮方略的編纂，容或也是類似脈絡下轉化明清官員盛行的戰事相關奏議集而來。

如果再從官修並刊印方略的效應來觀察，也可看到與清宮收編士大夫宦蹟圖和戰勳圖像等視覺文化的近似反應。這些明代以來官員流行的圖像為盛清皇帝轉化成記錄皇帝與帝國勳績的官方圖繪、並刻版印刷大量流布後，民間個人宦蹟圖和戰勳圖的製作逐漸隱沒衰微，要到晚清才復甦；而且除了臣僚奏謝摺外，都未見其他文士的回應或評論。<sup>144</sup>同樣的，方略也是如此。<sup>145</sup>清代方略所收編的官員戰事相關奏議集原來是

<sup>143</sup> 關於是否可以「帝國(empire)」來指涉大清，學界並未達成共識，其中牽涉的不僅是學術的爭論，還有民族主義等複雜脈絡。相關的討論可參 Mark C. Elliott(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1(北京，2014)，頁 29-40；歐立德、定宜庄，〈二十一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收入彭衛主編，《歷史學評論》，第 1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116-146；曹新宇、黃興濤，〈歐洲稱中國為「帝國」的早期歷史考察〉，《史學月刊》，5(河南，2015)，頁 52-63。

<sup>144</sup> 馬雅貞，《刻畫戰勳》。除了《刻畫戰勳》已經提到梅韻秋觀察士人鮮少評論盛清大量御碑的例子外，最近高彥頤(Dorothy Ko)的新書也注意到士大夫甚少對康熙宮廷大量賞賜的松花硯加以評論的現象，Dorothy Ko,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46-47.

<sup>145</sup> 雖然目前尚未見士人對方略直接評論，但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數個乾隆到咸豐年間編纂年譜例子，可以一窺時人對於清宮出版方略的回應。鄂容安(1714-1755)於乾隆前期為其父鄂爾泰(1680-1745)編纂的年譜抄本，出現偶爾節錄奏文和硃批的現象，或可視為官員於乾隆前期的較早嘗試，但可能因為並未刊刻，流傳和影響有限。嘉慶初嚴榮(1761-1821)為王昶(1742-1806)所編《述庵先生年譜》收於嘉慶十二年(1807)《春融堂集》刊本末，嚴榮並沒有直接收入王昶的奏文，但應該從中頗為詳細地摘要其參與的諸多政事。嚴榮

私撰之作，<sup>146</sup>但康熙朝開始刊印乃至乾隆朝常設方略館大量編纂並由

自認為比之前三位為王昶編纂的年譜「所紀為詳，將來徵文考獻，知人論世，或有取於此焉」。嘉慶年間那彥成(1764-1833)編輯的《阿文成公(阿桂，1717-1797)年譜》，和《德壯果公(楞泰，1749-1809)年譜》都出現全文收錄奏摺甚至上諭等現象。祁嵩藻為《德壯果公年譜》的序言：「竊為國家以武功靖天下，一時名將帥壯，猶偉績彪炳，旗常鐘鼎間，後先相望。願方略列傳，藏之史館，人間不恆覯；家乘行狀誌銘，補掇拾刪削，去取不盡；或年月官位多舛悞，亦無以該舉其全。嘉慶中，那文毅為其祖父阿文成公年譜，迺始編載綸言章奏。年經月緯，勒成一書。聞其義例定於王蘭泉司寇(王昶)，繁而不蕪，詳而有法，洵紀述之善者也。」他一則對方略列傳藏之史館而無法讓更多人知曉，感到可惜；二則對《阿文成公年譜》開始收錄綸言章奏的清晰與詳盡章法，甚為稱讚；三則將此作法追溯自曾任阿桂幕僚的王昶定下的義例。這幾年譜中所見按時間編入「綸言章奏」的做法，和清朝方略頗為類似。雖然未見王昶自己所訂義例的年譜，但從《鄂爾泰年譜》、《述庵先生年譜》、《阿文成公年譜》和《德果壯公年譜》，顯示官員逐步將奏疏納入年譜。合而觀之，或可說這些例子展現了乾隆朝以來官員對於清宮方略的回應：不論是被動地接受方略影響或是積極地運用方略體例，他們都不再直接出版個人戰事奏議集，而是以「年譜」為名收入奏議，既迴避了與皇帝方略爭勝和禁止私刻奏疏的規定，又能具體用奏疏宣揚事蹟。如此來看，這些年譜展現了本文後文所述，從盛清逐漸消失到晚清再度復興刊刻個人奏議集的過渡階段，官員的反應和清宮方略的出版確實是息息相關。鄂容安等撰，李致中點校，《鄂爾泰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嚴榮，《述庵先生年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清嘉慶十二年青浦王氏塾南書舍刊本影印)；那彥成，《阿文成公年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54-5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嘉慶癸酉年刻本影印)；祁嵩藻，〈德壯果公年譜序〉，收入花沙納編，《德壯果公(楞泰)年譜》(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據咸豐丙辰年刻致遠堂藏校本影印)，頁5。

<sup>146</sup> 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頁4。

武英殿刊印方略後，<sup>147</sup>私撰的戰事相關奏議集逐漸消失，<sup>148</sup>也是到了晚清才又再度復興，<sup>149</sup>前已述及盛清時期亦少有士大夫對方略的評

<sup>147</sup> 武英殿本方略刊印後頒賜流傳的資料有限，但如乾隆《國子監志》就有收貯《親征平定朔漠方略》的紀錄。梁國治等奉敕，《國子監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51，經籍1，頁15a。

<sup>148</sup> 關於清初私史的研究參閱紅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體為研究對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不過，方略和個人戰事奏議集的消長關係並不是立即發生，前引鄂海《撫苗錄》刊印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例子，就可見康熙前中期創發方略後，即便滿洲旗人到了後期也仍有少數延續刊刻個人戰事奏議集者。當然乾隆禁止私刻奏疏也是官員奏議集消失的原因之一(康熙朝中期密奏制度形成後，禁止官員洩漏奏摺內容；雍正皇帝繼位後，下令官員須將奉硃批的奏摺繳回，並形成慣例，資料形同為官方「壟斷」，才有所謂的禁止私刻)，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數條飭查私刻奏疏的檔案。如以下兩則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錄副，〈奏報遵旨查繳大員刊刻祖父奏疏板片并自請呈繳曾祖父平閱記一事〉(檔號03-9666-013)，和〈奏為遵旨查明臨桂縣有原任大學士陳宏謀等其子孫均未會偽刻奏疏朱批等事〉(檔號04-01-38-0013-002)。相對的，康熙朝個人戰事奏議集的盛行固然也和朝廷並未禁止刊印有關，但不表示官員沒有自我審查，如張玉書(1642-1711)〈蕭長源奏疏序〉就提到「不收密奏」。賀長齡等編，《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14，〈治體〉8，頁28。雍正朝則有十分特殊的田文鏡(1662-1733)《撫豫宣化錄》、《總制宣化錄》，乃皇帝下令編纂作為其他官員書寫奏議的範本。田文鏡，《撫豫總制宣化錄》。關於盛清奏摺的掌控，參莊吉發，《清代奏摺制度》(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9)和《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

<sup>149</sup> 筆者尚未對晚清個人奏議集進行系統的研究，但檢索各大圖書館目錄和相關電子資料庫的經驗，明朝與晚清是個人奏議集出現的高峰。茲列舉數例，如麟慶(1791-1842)，《麟見亭奏稿》(收入《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原件影印)、吳汝綸(1840-1903)，《曾國荃剿匪疏牘摺奏秘稿》(收入《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原件影印)等。另外，目前出版影印的稿本中多是依時序編輯過並有目錄的，應該是原來是準備刊行，例如麟慶，《雲蔭

論。清代方略與動蹟圖相近的官修與私撰間之消長關係，反映了清宮在收編此類宣揚個人政績的官員文化方面有類似的效果：一旦官方透過方略對戰事史有了統一的皇權論調，士人也就難以置喙，而逐漸不再編纂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或私撰戰事史；就像當皇帝大舉以圖像傳播其君王事蹟與帝國武功時，亦鮮有官員的宦蹟或戰勳得以或敢與皇帝的帝國大業相比擬，原來廣泛流行的官員文化莫怪乎只能逐漸銷聲匿跡，而士大夫面對其文化風潮被皇權收編的現實，除了噤若寒蟬外恐怕也別無選擇。如此來看，康熙朝之所以新創方略，並不只是過去學界所言尚武文化的體現，而與滿洲皇帝轉化主流士大夫文化來建構文化霸權的脈絡密不可分。

---

堂奏稿》(收入《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原件影印)、王文詔(1830-1908)，《退園老人宣南奏議》(收入《中國史學叢書三編》，第9冊，臺北：學生書局，1986，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清光緒間清稿本影印)、袁世凱(1856-1916)，《養壽園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據沈祖憲據正本朱批和附單手彙稿影印)。甚至有刊本不存，而稿本反而留世的，如王茂蔭(1798-1865)門人易佩紳於光緒四川藩署刊刻的《王少宰奏議》(收入《中國史學叢書》，第10冊，臺北：學生書局，1965，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手鈔本影印)。清宮收編士大夫文化後所產生的效應，雖然缺乏具體觀眾回應的材料而很難確認，但仍有跡象得以觀察出就不同類型而有不同效果。例如清宮開始製作戰勳圖後，官員的個人動蹟圖逐漸隱沒，一直要到晚清個人戰勳圖才有復興；而與王汎森最近以「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來比擬盛清文字獄所造成的士人自我壓抑、以及禁書在晚清重新出現的狀況十分類似，應該都是文士面對浩大皇權而選擇默然迴避、但當皇權力量降低時則又復出的結果。相對的，乾隆開始遍土立御碑後，文士轉而投入訪尋古碑的活動等。馬雅貞，《刻畫戰勳》，頁247-248；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學術、思想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Mei Yun-chiu,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

如果進一步分析康熙朝最早編纂的《平定三逆方略》，也可以看到它和明清標榜個人的戰事相關奏議集類似，只是改以康熙皇帝為中心，收錄其上諭和相關衙門部議奏摺等，並加上大臣頌揚的按語，這些調整也就是康熙宮廷轉化官員文化之再一例。此方略原名《平定三逆神武方略》，強調康熙皇帝運籌帷幄之卓越，之後不見「神武」兩字；<sup>150</sup>但原來的編纂源由：

御史臣戴王縉因疏言：「皇上布昭聖武，削平禍亂；宵旰經營，永清大定。耿光盛烈，曠古罕有。請匯纂成書，昭示無極。」疏入，下內閣翰林院集議以聞。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覺羅勒德洪等謹議：「臣聞歷代紀載功烈，俱有成書……彼或借箸臣下，不皆獨斷之功；亦或蠢茲小醜，有如摧枯之易；猶揭之簡策，炳耀可觀。豈若我皇上神機獨運，掃除大憝；迪屢弗靖多方之眾，降滅無遺孽，告厥成功；八載之間，纖毫無遺算。師不宿老，方內乂安；至仁大勇，巍巍超越前代。」<sup>151</sup>

說明此方略的目的在於記錄康熙指導作戰的神機妙算，和明清戰事相關奏議集推崇個別官員善於用兵等的意味相當。此外，《平定三逆方略》各卷在依時序羅列上諭的同時，還不時以史論方式插入「臣謹按」推崇皇帝與清軍的按語，<sup>152</sup>而與前述明清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評點作用相近，都是用來稱頌主角統馭的識見和能力。如：

巴蜀乃滇、黔之門戶，逆賊豈無窺伺之心！顧尚有所未暇，使我師扼蜀之險要，進可以取滇、退可以守；豈獨賊咋死不得入，而湖南之渠逆亦且狐疑狼狽，徘徊前卻。蓋廟算深矣。不意諸將師

<sup>150</sup> 姚繼榮率先從康熙實錄中觀察到此一變化，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頁 77。

<sup>151</sup> 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卷 1，頁 3-4。

<sup>152</sup> 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頁 200。

行少緩，蜀變旋作，關隴弗靖，致煩天討：益服睿智之先見也。我朝禁旅萃於八旗，適符古法；兵皆天子之親軍，而將皆腹心股肱爪牙。訓習有素，部勒嚴明。無事則兵歸於伍、將歸於朝；有發則將皆夙儲、兵已素練，無簡稽召募之勞。故三桂反書朝聞，而調遣夕辦。民方苦於塗炭，望若雲霓；而我師之馳驅，捷於風雨。賊欲掩我之不備，我則疾出其不意以制之。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此之謂也。<sup>153</sup>

乃至全書卷末的跋文以「總之，皇上乃聖、乃神、允文、允武；戡禍亂、開太平，經理靡弗盡善：如上天之緯，難以名言。臣等雖勉綴數詞，不過綜括大凡；實自愧於至德豐功，敷揚莫罄云爾」作結，<sup>154</sup>更是將康熙皇帝吹捧地無以復加。<sup>155</sup>不過，《平定三逆方略》和一般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還是有所不同，其差異顯示宮廷方略的非凡之處。負責編纂的大臣雖然以「臣謹按」的方式扮演如同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評點人，但他們臣屬的角色更為明顯。他們在全書開始處就以臣子的身分說明平藩成功後請上尊號被拒、御史疏請編纂的緣由；之後將整個平藩事件，按時間先後將上諭和大臣奏報等內容，編輯成以皇帝為中心更為完整的敘事。之後會討論的《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更是溯源自康熙十六年(1677)，涵蓋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十間的要事，而不是只有後來的親征活動，所呈現的時段也就較一般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長，而整個平定事件的重要性亦更加宏大。<sup>156</sup>可以說《平定三逆方略》收編明清的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將官員個人奏疏代換為皇帝上

<sup>153</sup> 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卷 1，頁 10-11。

<sup>154</sup> 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卷 60，頁 479。

<sup>155</sup> 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卷 60，頁 479。

<sup>156</sup>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醒清代方略涵蓋時段較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為長，以及皇權刻意和官員、士人有所區隔的策略。

諭、用大臣按語替代友儕評點，並透過臣屬編輯出更為完備且宏大的重要歷史敘事，成功轉化成非凡的康熙皇帝版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上述清代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以序、題贈詩文、評論等褒揚方式來表彰官員的傾向愈發盛大，康熙朝方略在歌頌皇帝的面向卻出現相反的發展趨勢。相對於初期編纂的《平定三逆方略》大量穿插臣屬按語來推崇康熙皇帝，康熙四十七年(1708)輯成的《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卻大幅降低歌頌的部分，除了卷首〈進方略表〉和卷1開始的說明對康熙皇帝有所頌揚外，<sup>157</sup>全書既無大臣的序跋，更摒除所有的稱頌按語，回歸按時間先後編排上諭和相關部議的合集。而且《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首唯二的兩篇御製序和記，突顯的也非康熙自己的神勇，卻是他「不避寒暑、艱辛親泣」或「不懷安逸、不恃尊榮，與軍士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飲濁水」的聖明特質。若考慮早期編纂的《平定三逆方略》並未刻版，晚期撰輯的《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完成後即由武英殿刊印，應更能代表康熙皇帝最終對方略編輯的要求。<sup>158</sup>倘若如此，那麼何以早晚期的方略在頌揚皇帝方面出現如此大的變化，對比下康熙宮廷其他編纂的情形為何，又應

<sup>157</sup> 溫達等奉敕撰，《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5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首，頁1。另外，雖然《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未收頌詞，但《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彙編》第三冊就收入了一百多人歌頌的《蕩平噶爾丹彙頌》，也可對照《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刻意不錄頌言。張羽新、趙曙青主編，《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彙編》，第3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201-294。

<sup>158</sup> 論者或言《平定三逆方略》和《平定朔漠方略》的差異，和前者是康熙皇帝解決了懸念已久的「三大事」之一，故記述意氣風發；後者雖是御駕親征，但實因準噶爾汗噶爾丹病死方使戰爭告一段落，故方略中保持低調。不過若康熙皇帝欲採低調，大可不編纂或是不刊印方略，相反的，《平定朔漠方略》卻是清宮首度由武英殿印行的方略，其中的編纂策略和內容，或應視為康熙所宣示的帝國武功形象。

該如何理解刊刻《親征平定朔漠方略》的意義呢？

若與同樣刊印於康熙晚期、作為其文治象徵的《幸魯盛典》和《萬壽盛典初集》相較，此二者收錄的臣僚歌頌詩文佔了全書之半，<sup>159</sup>但作為其武功表徵的《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卻全無頌文，顯示康熙皇帝對於紀錄其文治和武功的出版有十分不同的考量。<sup>160</sup>尤其最初孔毓圻(1657-1723)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纂修《幸魯盛典》初成時，頌言僅佔九分之二的篇幅，康熙帝特別指示「臣工詩文尚有應遴選入者」，歷經二十餘年在康熙五十年(1711)終於刊刻成書，大幅從 4 卷增加為 20 卷，<sup>161</sup>更可確定他對於收錄頌詞的重視。儘管過去朝代不乏應制詩或君臣唱和，但如此大量收入臣下頌文的作法，實鮮見於歷代宮廷編修的典籍，而不禁令人聯想到明清以來士大夫盛行出版贈詞的文化。雖然頌揚文化由來已久，歌功頌德的阿諛之詞過去對史學家來說並無史料價值而不時捨棄，如謝國楨(1901-1982)在《增訂晚明史籍考》凡例言「頌諛之文，駢詞攤藻者，概不泛登」。<sup>162</sup>明清時期也不乏視之如敝屣者，像乾隆三十七年(1772)編纂《四庫全書》所下第一道徵書上諭即言：「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驚，編刻酬唱詩文，瑣碎無當者，均無庸採

159 孔毓圻、金居敬等撰，《幸魯盛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王原祈等撰，《萬壽盛典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3-65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160 拙著認為《康熙南巡圖》、《萬壽盛典初集》視為是轉化士大夫宦蹟圖等官員文化的結果，強調的是康熙皇帝仁德「聖主」的文治形象。《幸魯盛典》或也可從類似的角度視之，亦是標榜康熙文治的宮廷製作，而可和宣揚其武功的方略並列來比較。馬雅貞，《刻畫戰勳》，頁 135-140。

161 孔毓圻、金居敬等撰，《幸魯盛典》。

162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凡例，頁 18。再如《史料七編》所刊鄂海《撫苗錄》也無第 7-8 冊《紅苗歸化恭紀詩·紅苗歸化恭紀詩跋》。

取」。<sup>163</sup>但近來學者重新檢視標舉地方官政績的元代去思碑和明代生祠的流行，<sup>164</sup>發現與士人交游、地方社會等密切相關，而不失為理解社群活動等的媒介。尤其序跋、贈詞和評點等士人互相標榜的方式，<sup>165</sup>自明代中後期的許多藝文表述中都極為盛行，清初風行的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反映的也是士大夫的社交世界。不論是文學如《四庫全書總目》言曹貞吉(1634-1698)《珂雪詞》：「舊本每調之末，必列王士禎……等評語，實沿明季文社陋習，最可厭憎，今悉刪除，以清耳目……名流之序跋評點」，<sup>166</sup>上述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所附頌文，或《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功績錄》收「七言絕句九十六首」、<sup>167</sup>《惠獻貝子忠定錄》「後附頌言」，<sup>168</sup>乃至專收題贈詩文者，如沈有容的(1557-

16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頁 897。

164 陳雯怡，〈從去思碑到言行錄——元代士人的政績頌揚、交游文化與身分形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86：1(臺北，2015.3)，頁 1-52。  
何淑宜，〈晚明的地方官生祠與地方社會——以嘉興府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86：4(臺北，2015.12)，頁 811-854。

165 另外尚有如編輯當代詩選集等，參 Tobie Meyer-Fong, "Packaging the Men of Our Times: Literary Anthologies, Friendship Networks, and Political Accommodation in the Early Q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4:1 (June 2004): 5-56. 感謝李仁淵提醒此文。

166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199，頁 1823。

167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 700。不著撰者，《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功績錄》(收入《四庫全書珍本》，第 11 集，5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未載版本)，提要，頁 2b。

168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 701。德沛，《惠獻貝子忠定錄》(收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 32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影印)，頌言卷，頁 1-26。

1628)《閩海贈言》、<sup>169</sup>湯若望(1591-1666)的《碑刻贈言》、<sup>170</sup>王翬的(1632-1717)《清暉贈言》等，<sup>171</sup>都是當時士大夫風行相互表彰的文化現象。相對於明清士人彼此吹噓的負面「陋習」，現代學者對於明中後期士大夫的公論風潮則相當肯定。<sup>172</sup>然而，頌言與公論何嘗不是同一銅板的兩面，均藉由眾言來製造輿情。只是前者聚焦於個人榮光而易為人詬病，但風潮所及，鮮有士人能置身其外。從這個角度來看，《幸魯盛典》和《萬壽盛典初集》中累牘的頌詞容或也是收編士大夫相互稱揚風潮的產物，意在展現臣民對皇帝政績的公論；而其編纂本身又何嘗和明清官員政績錄及士人慶壽文化無關，<sup>173</sup>應都是上述康熙宮廷轉化士大夫盛行文化的一環，藉之來展現其文治政績。

相反的，康熙皇帝對於其武功，卻採取了相當不同的表現策略，越趨不以他個人為中心。首先，儘管康熙時期官員製作戰勳圖的風潮有增無減，但康熙院畫卻無此類和他個人武功事蹟緊密連結的圖畫，反倒贊助了 12 卷的《南巡圖》、刊印《御製避暑山莊詩》等形塑其聖主仁德形象的大型圖繪計畫，而無意以圖像來宣示其個人戰勳。<sup>174</sup>再者，

169 沈有容，《閩海贈言》(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崇禎二年刻本)。方豪，〈陳第東番記考證、附論閩海贈言〉，《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7(臺北，1956)，頁 41-76+76\_1-76\_10。

170 紀建勳，〈《碑記贈言》合刻版本篇目互校〉，《國際漢學》，2(北京，2014)，頁 81-97。

171 王翬，《清暉贈言》(收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 30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影印)。

172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 155-166。

173 邱仲麟，〈誕日稱觴——明清社會的慶壽文化〉，《新史學》，11：3(臺北，2000.9)，頁 101-156；馬雅貞，《刻畫戰勳》，頁 135。

174 馬雅貞，《刻畫戰勳》，頁 135。

康熙四十三年(1704)親征平定朔漠後，首創遣官告祭先師孔子，並於國子監／孔廟豎立「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自此告成太學與勒石紀功成為清帝國軍禮的一環，<sup>175</sup>到了乾隆朝更加上「以平定方略，宣付史館」作為親征勝戰的最後儀式；<sup>176</sup>這些儀典都不以稱揚皇帝武功為中心，而是超越皇帝個人，將平定戰功提升至帝國武勳的層次。換句話說，如果臣民的稱揚有助於襯托康熙文治的聖主光環，新軍事儀典的建立則昇華其個人戰勳為帝國武功。莫怪乎即便《親征平定朔漠方略》記錄康熙皇帝親征噶爾丹(1644-1697)，卻全無《平定三逆方略》稱揚皇帝的按語或《幸魯盛典》和《萬壽盛典初集》歌詠康熙的頌詞，其御製序和記也強調其聖明而非神勇。先前編纂的《平定三逆方略》或許亦因過於著重皇帝「神武」，而未能與康熙最終建構的武勳文化若合符節，所以也就未加刊印。

儘管康熙宮廷轉化明清官員標榜自身文武功績的方式有所差異，但不論是文治的《幸魯盛典》和《萬壽盛典初集》，或武功的《平定三逆方略》與《親征平定朔漠方略》，都與康熙皇帝收編士大夫盛行文化的脈絡息息相關。不無反諷的是，過去學界視方略為滿洲尚武文化的一環固然有其道理，但相對於明清官員以戰勳圖或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大肆地宣揚自己的武勳，康熙宮廷卻始終未曾製作戰勳圖繪來宣揚康熙帝的親征武功，也終究捨棄《平定三逆方略》仿若皇帝版的

<sup>175</sup> 馬雅貞，《刻畫戰勳》，頁135。朱玉麒，〈從告於廟社到告成天下——清代西北邊講平定的禮儀重建〉，收入《東方學研究論集刊行會編》，《高田時雄教授退休紀念東方學研究論集》(京都：臨川書店，2014)，頁397-411。

<sup>176</sup> 允禩奉敕撰，《大清會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35，〈禮部〉，頁8b；來保奉敕撰，《大清通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40，〈軍禮〉，頁22b。

戰事相關奏議集中對康熙的大肆吹捧，卻是以大幅褪去歌頌皇帝個人勇武的《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作結，和在太學告祭孔子與豎立戰碑一同形塑出獨特的清帝國軍禮文化。

## 五、結語——乾隆朝的方略變化和定位的改變

相對於康熙宮廷選擇性地收編明清標榜官員武勳的文化模式，著重於建立超越皇帝個人的帝國儀典，乾隆朝則是逐漸轉化戰勳圖和方略的形式和內容，使之成為清帝國武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環。以戰勳圖來說，乾隆初期開發了以軍事儀典為題材的宮廷圖繪，平定回疆時則逐步發展出以儀式為主的紫光閣戰勳圖、和運用「中西融合」技法表現激烈戰況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來展現壯盛帝國之師恢弘有序的勝戰形象，成為後續重要戰役武勳表述之典範。<sup>177</sup>就方略而論，乾隆朝開始常設方略館，<sup>178</sup>修纂並刊刻了十部以上的方略；每部方略雖略有不同，但都不再以褪去稱揚康熙個人神勇的《親征平定朔漠方略》為依歸，而是比照頌揚皇帝文治政績的書籍編輯方針，一則以按語或頌文來展現諸臣對帝國武勳的公論，另則強化乾隆作為帝國之君運籌帷幄的武功內容。乾隆朝最初修纂的《平定金川方略》就一反《親征平定朔漠方略》而回歸《平定三逆方略》加入臣下按語，並在全書 26 卷的最後以近五分之一的 6 卷「藝文」，收入御製詩文 1 卷和諸臣紀功詩文 5 卷來宣揚皇帝的武勳；而且除了方略原有的上諭和新增御製詩文對用兵策略等的自我表述外，還加錄乾隆對作戰將軍等奏摺的御批，如此「詔諭之指授、章奏之批答」更為全面地呈現乾隆

<sup>177</sup> 馬雅貞，《刻畫戰勳》，頁 144-243。

<sup>178</sup> 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頁 25-28。

指導作戰的紀錄。<sup>179</sup>《平定金川方略》之後的乾隆朝方略除了沿襲按語和奏摺等外，更逐漸形成卷首為「天章」的模式；<sup>180</sup>方略中御製詩文從書末「藝文」到書前「天章」的變化，就像高晉(1707-1778)最初編纂《南巡盛典》時「恩綸」門為首、次為「天章」，但到了館臣修纂《四庫全書》時：

臣等恭校欽定諸書裒入四庫者，稽其凡例類，皆以天章冠首。今是書彙纂進呈，伏俟欽定後即繕帙裝函，歸於四庫。自應改從畫一，爰敬錄天章於各門之首，而謹輯恩綸以繼之。<sup>181</sup>

「天章」或「宸章」凌駕於其他門類成為皇帝欽定書籍如《八旬萬壽盛典》的定式。這樣來看，可以說乾隆朝的方略將皇帝版的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發展到極致，以「天章」的位階、「章奏之批答」、大臣按語和諸臣頌文等，強化方略作為帝國之君專屬的武勳紀錄；而不像

<sup>179</sup> 來保，《平定金川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5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提要，頁7a。

<sup>180</sup> 如阿桂等撰，《平定兩金川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60-36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阿桂等撰，《欽定蘭州紀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6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紀昀等撰，《欽定石峰堡紀略》(收入《四庫全書珍本》，第110-1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影印)；清高宗敕撰，《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6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不著撰人，《欽定安南紀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專案檔暨方略叢編》，臺北：沉香亭企業，2007，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像授權監製)；不著撰人，《欽定廓爾喀紀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專案檔暨方略叢編》，臺北：沉香亭企業，2007，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像授權監製)。

<sup>181</sup> 高晉等編，《欽定南巡盛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8-6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凡例，卷首，頁3。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降低對康熙神武的強調，以成為告成太學、勒石紀功等超越個人戰勳的帝國儀典之一部分。也就是說，相對於康熙有所保留地收編明清官員標榜自身武勳的戰勳圖和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一則避免皇帝「個人」的戰勳圖，另則逐漸削弱方略中皇帝的「個人」色彩，以拉抬「帝國」的重要性；乾隆則全然轉化兩者著重個人勳蹟的「個人」部分，將其中的「個人」完全置換為「皇帝」，並將「皇帝」直接等同為「帝國」；乾隆一方面透過帝國軍禮的題材和展現王師與敵軍激戰的「中西融合」形式，將「個人」戰勳圖轉化為「帝國」戰勳圖以表述帝國武功；另一方面以「天章」等加強皇帝作為帝國代表的位階，讓方略成為帝國武勳的紀錄。要之，把明清「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徹底轉變為「皇帝」專屬的乾隆方略，而非只是康熙「皇帝版」的戰事相關奏議集。

如此為盛清宮廷收編轉化而成的方略，就像明清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在目錄分類學既可列屬「集部」亦可歸為「史部」一樣，既與滿洲皇帝密切相關，也可視之為官修史書；但在《四庫全書》定為「史部」之「紀事本末」類後，吾人多忽略其以編纂皇帝上諭為核心的性質，而著重其提供史料的作用。成書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國朝宮史》之「書籍」類，就將「實錄」、「聖訓」、「御製」、「方略」置於「典則」、「經學」、「史學」等其他項目之後，「首登實錄，以彰功德之原。次紀訓諭，以昭詒謀之大。於御製仰聖學之高深，於方略述成功之懿鑠」，<sup>182</sup>將方略定位成和皇帝有關的編纂。同樣的，除了本文前言已經提到的勒德洪將方略修纂追溯自歷代關於皇帝的相關編纂外，康熙方略最早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起居注記錄：

<sup>182</sup> 于敏中，《國朝宮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22，「書籍」，頁2。

王縉條奏：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聖訓應行纂修，及比年以來，凡係用兵詔命密旨、征剿機宜，並應編纂成書，以垂不朽。上曰：太祖、太宗、世祖聖訓，垂法萬世，關係重大，理應纂脩。至朕所行之事，編纂成書……。

以及後來「大學士、學士隨捧折本面奏請旨：為禮部題，設纂修太祖、太宗、世祖聖訓大臣、官員及設編纂皇上八載用兵以來，神威運籌，凡告諭、密旨，大臣、官員照例賜宴事」，<sup>183</sup>亦均是將編纂方略和清代歷朝皇帝聖訓的纂修並提，可見方略從一開始就是作為和皇帝有關的纂輯。但到了《四庫全書》於「史部」新立「紀事本末」類，將方略改隸其中之後，<sup>184</sup>自此成為定制；例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皇朝通志》將方略等收入「藝文略」之「史類」，乃「謹依欽定四庫全書之例，增列紀事本末一門」。<sup>185</sup>而魏源(1794-1857)《聖武記》認為「方略之體例，至乾隆而盡善」，主要的原因是康熙朝方略「專載上諭，不載奏疏」，也是自史書的角度來看待方略(雖然他的說法有誤，實際上康熙和乾隆朝的方略都有收入部臣奏議)。<sup>186</sup>不過就算方略只錄上諭，如果從康熙朝編纂方略原本就是和皇帝最為相關來說，只收皇帝的上諭也不是不能接受的。前引乾隆朝最早纂輯的《平定金川方略》收入乾隆對部臣將

<sup>18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879-881、891。

<sup>184</sup>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49，頁437-445。

<sup>185</sup> 劉墉等撰，《欽定皇朝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99，頁5b。相對的，《皇朝文獻通考》則沿襲馬端臨《文獻通考》的分類，將方略納入「編年」。張廷玉等撰，《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3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219，頁7-32。

<sup>186</sup> 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頁96-97；魏源，《聖武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據道光二十六年本)，附錄卷12，「武事餘記掌故考證」，頁491。

領奏疏的御批，強調的就是「詔諭之指授、章奏之批答」能夠更為完整地展現皇帝指揮戰爭的紀錄，亦再次驗證了清朝方略和明清以來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密切關係，都同屬以「個人」（官員或皇帝）為中心的編纂類型。更重要的是，《皇朝通志》和《聖武記》都顯示乾隆朝《四庫全書》將方略納入史部後如何影響後世對於方略的理解，而與康熙創發方略的概念不盡相同。

不過，《四庫全書》對方略的新分類，牽涉的不只是「集部」和「史部」的歸屬，容或更觸及以「紀事本末」界定方略，以及定位方略與戰事相關奏議集關係的課題。現代學者認為雖然晚明清初已經出現將紀事本末和編年、紀傳體相提並論的說法，但一直要到《四庫全書》館臣在「史部」新設「紀事本末」類，才確立了紀事本末作為一種新的史書編纂體裁。<sup>187</sup>《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大費脣舌說明其因：

古之史策，編年而已，周以前無異軌也。司馬遷作《史記》，遂有紀傳一體，唐以前亦無異軌也。至宋袁樞，以《通鑿》舊文，每事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敘其始終，命曰《紀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體。夫事例相循，其後謂之因，其初皆起於創。其初有所創，其後即不能不因。故未有是體以前，微獨紀事本末創，即紀傳亦創，編年亦創。既有是體以後，微獨編年相因，紀傳相因，即紀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眾，遂於二體之外，別立一家。今亦以類區分，使自為門目。<sup>188</sup>

並提出收入此類的準則：

凡一書備諸事之本末，與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者，總匯於此。其不標紀事本末之名，而實為紀事本末者，亦並著錄。若夫偶然

<sup>187</sup> 劉海波，〈略論紀事本末體裁的發展歷程——以目錄學為視角〉，《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2(濟南，2011.3)，頁34-38。

<sup>188</sup>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49，頁437-445。

記載，篇帙無多，則仍隸諸雜史傳記，不列於此焉。<sup>189</sup>

然而，如此以事為由的標準十分鬆散，既非比照最早袁樞以《資治通鑑》為本加以編裁成《通鑑紀事本末》的方式，也不以書名有無「紀事本末」來判定，特別是如何與雜史乃至傳記類區分，實不無自由心證之嫌。民初學者劉咸炘(1896-1932)就批評：

惟是此體之成本起袁樞，其他雜史之中固多以事名篇，要不得為紀事本末，而《提要》用廣收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者，謂為其不標紀事本末之名，而實為紀事本末，則謬矣……若偶記一事而具始末，雜史、傳記，誰不然邪。<sup>190</sup>

細查《四庫全書》「紀事本末」所收書籍，也的確類型不一，很難說有一致的準繩。<sup>191</sup>以方略來說，姚繼榮就認為是「資料匯編性質」之「紀事本末體史書的新形式」，和袁樞改編既有史書而成的紀事本末體其實相當不同。<sup>192</sup>不禁讓人懷疑《四庫全書》新立此類是否也與方略佔「紀事本末」所收書籍數量近二分之一有關，將方略歸屬在和編年、紀傳三足鼎立的「紀事本末」類不僅具有拉抬方略重要性的作用，同時也迴避了本文所論方略體例和明清官員戰事相關奏議集最為相關的事實。尤其後者即便同樣「具一事之始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卻以「非一代之全編」等不明理由劃屬雜史；<sup>193</sup>不無硬是將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排除在「紀事本末」外的疑慮，以及淡化其與方略連結之嫌。若再考量《四庫全書》新立「詔令奏議」類特地將皇帝制誥

189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49，頁 437-445。

190 轉引自劉海波，〈略論紀事本末體裁的發展歷程〉，頁 37。

191 葛煥禮，〈紀事本末體創始說辨正〉，《文史哲》，329(濟南，2012)，頁 101-110。

192 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頁 4。

193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49、51，頁 437-445、460-467。

和官員奏議並舉，<sup>194</sup>但摒除具詔諭的方略和無「奏議」等標題的官員戰事相關奏議集，也不無宣示對比皇帝和官員政事之文的是詔令與奏疏，而非分屬「紀事本末」和「雜史」的方略和戰事相關奏議集，或許亦呼應上述削弱兩者干係的傾向。尤其若參照本文第二節提及的明代《萬卷堂書目》奏議類，就收入無「奏議」等標題的官員戰事相關奏議集，如陳鈐《安邊錄》、許論《三捷錄》等；<sup>195</sup>也可見這些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未必非得排除在「詔令奏議」之外而劃入「雜史」類，卻可能是《四庫全書》館臣有所選擇的結果，降低了方略和官員戰事相關奏議集的關聯。合而觀之，以上的討論並不在於加入學界對於四庫館臣史部分類和史籍歸屬合理性與否的論戰，而是分析在四庫的分類和歸屬下，所呈現出方略和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關係，以及其中所透露的意涵。透過《四庫全書》「詔令奏議」、「雜史」、「紀事本末」三類對於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和方略的不同歸屬，一則確立了皇帝詔令和官員奏議的上下政治位階，再則迴避了方略和官員戰事相關奏議集的關係，三則拉升了方略的地位。

無論如何，最初康熙朝新立方略的由來在乾隆《四庫全書》將方略歸入「史部」之後，逐漸為人所忽略，但若爬梳明清官員戰事相關奏議集的發展，就會發現其與康熙宮廷對官員文化的皇權轉化密切相關。向來被視為展現清廷軍事文化的方略，並非滿洲尚武精神的自然衍生，卻是康熙皇帝大幅並積極收編並轉化士大夫文化的一環，而為

<sup>194</sup> 本文前言提及《四庫全書總目》「詔令奏議類」所言元代《文獻通考》始以奏議自為一門的說法，和第二節談到的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文類」下即有「奏議」不符，但事實上《四庫全書》就收有鄭樵《通志》，因此《四庫全書總目》「詔令奏議類」強調奏議不應隸屬集部而必須劃歸為史部並和詔令並列的官方說法，容或是相當刻意的選擇。

<sup>195</sup> 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卷2，「詔令奏議類」，頁7a。

乾隆所承襲與發揚。從明清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到方略成為清朝的官方史書，牽涉的不只是士人「武」文化的自我標榜，還有康熙皇帝透過支配漢人菁英文化所建立的文化霸權，以及乾隆強化以表述清帝國武功的史籍新式。如果過去學界以清宮大量用戰碑、方略、戰圖等來記述和紀念戰爭的表現，為清代尚武文化的特色；現在吾人重新檢視清宮戰圖製作和方略編纂後，卻都發現所謂的滿洲武功文化，其實都與清宮收編明清士大夫的武勳文化不無關係，而能夠視為清代尚武文化的一大特徵，或可作為未來反思清宮其他文化的參照。

(本文於 2019 年 3 月 27 日收稿；2019 年 10 月 17 日通過刊登)

\* 本文研究獲科技部計畫 (MOST 104-2410-H-007-026) 補助，以及諸多圖書館如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等的協助。寫作期間曾於國立清華大學「近世以來文明變遷與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報告，感謝與會學者的提問和討論。投稿過程承蒙匿名審查人和編委會惠賜意見，獲益良多，特此致謝。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丁丙藏，丁仁編，《八千卷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2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民國十二年錢塘丁氏鉛印本影印。
- 于敏中，《國朝宮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不著撰人，《欽定安南紀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專案檔暨方略叢編》，臺北：沉香亭企業，2007，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像授權監製。
- 不著撰人，《欽定廓爾喀紀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專案檔暨方略叢編》，臺北：沉香亭企業，2007，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像授權監製。
- 不著撰者，《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功績錄》，收入《四庫全書珍本》，第 11 集，5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允禩奉敕撰，《大清會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1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孔毓圻、金居敬等撰，《幸魯盛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尹臺，《洞麓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九思，《溪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嘉靖刻崇禎補修本影印。
- 王士驥，《皇明馭倭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
- 王文韶，《退圃老人宣南奏議》，收入《中國史學叢書三編》，第 9 冊，臺北：學生書局，1986，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清光緒間清稿本影印。
- 王先謙編，《東華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37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據清光緒十年長沙王氏刻本影印。
- 王先謙編，《東華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37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 社，1996，據清光緒十年長沙王氏刻本影印。
- 王茂蔭，《王少宰奏議》，收入《中國史學叢書》，第10冊，臺北：學生書局，1965，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手鈔本影印。
- 王原祈等撰，《萬壽盛典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3-65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道明，《笠澤堂書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
- 王維楨，《槐野先生存笥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影印。
- 王翬，《清暉贈言》，收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30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影印。
- 王應麟，《玉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永恩，《誠正堂稿》，收入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6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乾隆刻本影印。
-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據道光二年阮元《學經室集》外集影印。
- 田文鏡，《撫豫總制宣化錄》，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
- 田汝成，《田叔禾小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88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6，據明嘉靖四十二年刻本影印。
- 石茂華，《毅庵總督陝西奏議》，收入姜亞沙、經莉、陳湛綺主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9，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 朱睦㮮，《萬卷堂書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清光緒二十九年長沙葉氏觀古堂書目叢刊本影印。
- 朱鑑，《朱簡齋奏議》，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重刊本。
- 佚名編，《閩嶺彙編》，收入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2輯，第1-7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 佟國器，《三撫密奏疏稿三撫捷功奏疏》，收入姜亞沙、經莉、陳湛綺主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
- 吳汝綸編，《曾國荃剿匪疏摺奏秘稿》，收入《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原件影印。

- 吳英撰，李祖基點校，《行間紀遇·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
- 呂柟，《涇野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1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據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于德昌刻本影印。
- 李光元，《市南子》，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汪道昆，《太函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1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汪應蛟，《海防奏疏、撫畿奏疏、計部奏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8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 汪應蛟，《海防奏疏、撫畿奏疏、計部奏疏》，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刊本。
- 沈正宗，《禦寇急務續集》，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丁十年刊本。
- 沈有容，《閩海贈言》，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崇禎二年刻本。
- 那彥成，《阿文成公年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54-5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嘉慶癸酉年刻本影印。
- 來保，《平定金川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5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來保奉敕撰，《大清通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祁承燾，《澹生堂書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清光緒間會稽徐氏刊《紹興先正遺書》本影印。
- 花沙納編，《德壯果公(楞泰)年譜》，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據咸豐丙辰年刻致遠堂藏校本影印。
- 阿桂等撰，《平定兩金川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60-36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阿桂等撰，《欽定蘭州紀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6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姜良棟，《鎮吳錄》，日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萬曆刊本。
- 施琅，《靖海紀事》，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3種，重印於《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6冊，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施琅撰，施士駟輯，《平海奏疏總錄》，收入姜亞沙、經莉、陳湛綺主編，《中國文獻

- 珍本叢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0，據清抄本影印。
- 紀昀等撰，《欽定石峰堡紀略》，收入《四庫全書珍本》，第110-1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影印。
- 倪元璐，《倪文貞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唐龍，《漁石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 徐圖等撰，《行人司重刻書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1939年王大隆刊《己卯叢編》本影印。
- 秦金，《安楚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史部，第4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6，據明刻本影印。
- 袁世凱，《養壽園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據沈祖憲據正本朱批和附單手稿影印。
- 高晉等編，《欽定南巡盛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8-6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5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收入《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6輯，第104冊，臺北：大通出版社，1987。
- 崔銑，《洄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張內蘊，《三吳水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張羽新、趙曙青主編，《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彙編》，第3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 張廷玉，《澄懷園文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張廷玉等撰，《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3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張袞，《張水南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影印。
- 梁國治等奉敕，《欽定國子監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0冊，臺北：

-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高宗敕撰，《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奏疏錄副，檔號 03-9666-013、04-01-38-0013-002。
- 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5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 陳思，《寶刻叢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清乾隆間長塘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影印。
- 賀長齡等編，《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 鄂容安等撰，李致中點校，《鄂爾泰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
- 鄂海、車鼎晉編，《紅苗歸化恭紀詩·紅苗歸化恭紀詩跋》，收入鄂海、車鼎晉編，《撫苗錄》，第 8 冊，東京東洋文庫藏，康熙五十二年序刊本。
- 鄂海、車鼎晉編，《撫苗錄》，第 1-7 冊，收入《史料七編》，臺北：廣文出版社，1978，據國立中央研究院藏本影印。
- 馮時暘、梁天錫、江美中輯撰，《安南來威圖冊》，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10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隆慶刻本影印。
- 楊博，《本兵疏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47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萬曆十四年師貞堂刻本影印。
- 溫達等撰，《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5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萬正色，《平岳疏議》，國立臺灣圖書館藏，康熙二十一年序刻本。
- 葉向高，《蒼霞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2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葉向高，《蒼霞餘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2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董裕，《董司寇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5 輯，第 2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清雍正十三年宸翰閣刻少保公全集本影印。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
- 劉光復編，《朝野申球疏》，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刊本。

- 劉伯燮，《鶴鳴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萬曆十四年鄭懋洵刻本影印。
- 劉知幾，《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劉墉等撰，《欽定皇朝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德沛，《惠獻貝子忠定錄》，收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32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影印。
- 德坤，《禮府家傳》，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第3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3，據清乾隆四十三年刻本影印。
- 韓邦奇，《苑洛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譚綸，《譚襄敏公奏議》，收入姜亞沙、經莉、陳湛綺主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9，據萬曆二十八年宜黃知縣顧所有刊本影印。
- 嚴榮編，《述庵先生年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清嘉慶十二年青浦王氏塾南書舍刊本影印。
- 顧起元，《懶真草堂集》，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68-69冊，明萬曆四十六年刊本影印。
- 麟慶，《雲蔭堂奏稿》，收入《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據國家圖書館收藏原件影印。
- 麟慶，《麟見亭奏稿》，收入《國家圖書館藏歷史檔案文獻叢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原件影印。

## 二、近人論著

- 山根幸夫，〈三巡奏議と胡宗憲〉，收入山根幸夫，《明清史籍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9，頁48-53。
- 方豪，〈陳第東番記考證、附論閩海贈言〉，《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7(臺北，1956)，頁41-76+76\_1-76\_10。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學術、思想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3。

-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何淑宜，〈晚明的地方官生祠與地方社會——以嘉興府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86：4(臺北，2015.12)，頁 811-854。
- 何廣棧，《陳振孫之文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集錄考證》，中和：花木蘭出版社，2010。
- 吳清燕，〈明代福建私人藏書家陳第交遊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學所碩士論文，2015。
- 昌彼得，〈跋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入昌彼得，《增訂蟬庵群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出版公司，1997，頁 99-116。
- 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 林育慈，〈尤袤及其《遂初堂書目》研究〉，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邱仲麟，〈誕日稱觴——明清社會的慶壽文化〉，《新史學》，11：3(臺北，2000.9)，頁 101-156。
- 長澤規矩也，《三巡奏議》，東京：古典研究會，1964。
-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北京：西苑出版社，2006。
- 紀建勳，〈《碑記贈言》合刻版本篇目互校〉，《國際漢學》，2(北京，2014)，頁 81-97。
- 徐福齡，〈《治河方略》〉，《中國水利》，1987：4(北京，1987.4)，頁 42。
- 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故宮學術季刊》，32：2(臺北，2014.12)，頁 39-80。
- 馬雅貞，〈戰勳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17(臺北，2011)，頁 49-89。(日譯見馬雅貞著，植松瑞希譯，〈戰勳と宦蹟——明代の戰爭圖像と官員の視覺文化〉，《東京大學史料編纂研究所研究紀要》，23(東京，2013)，頁 316-347；亦收入須田牧子編，《《倭寇圖卷》《抗倭圖卷》をよむ》，東京：勉誠出版，2016，頁 139-201。)
- 馬雅貞，《刻畫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 曹新宇、黃興濤，〈歐洲稱中國為「帝國」的早期歷史考察〉，《史學月刊》，5(河南，2015)，頁 52-63。

- 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
- 莊吉發，《清代奏摺制度》，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9。
- 莊琳芳，〈陳第及其世善堂藏書〉，福州：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文獻學所碩士論文，2008。
- 陳芹芳，〈姚啟聖與閩臺社會〉，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專門史所碩士論文，2004。
- 陳雯怡，〈從去思碑到言行錄——元代士人的政績頌揚、交游文化與身分形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86：1(臺北，2015.3)，頁 1-52。
- 黃瑋鈴，〈畫圖留與人看——由王原祁的仕途與畫業看清初宮廷山水畫風的奠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楊艷秋，〈明代目錄著作中的史部分類〉，《中國典籍與文化》，1(北京，2006)，頁 20-21。
- 楊艷秋，《明代史學探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葛煥禮，〈紀事本末體創始說辨正〉，《文史哲》，329(濟南，2012)，頁 101-110。
- 廖可斌，〈《征播奏捷傳》的成書方式和思想傾向〉，《文學遺產》，1(北京，2015)，頁 114-117。
-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文化現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劉海波，〈略論紀事本末體裁的發展歷程——以目錄學為視角〉，《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2(濟南，2011.3)，頁 34-38。
- 歐立德(Mark C. Elliott)、定宜庄，〈二十一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收入彭衛主編，《歷史學評論》，第 1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116-146。
-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收入錢穆，《錢穆先生全集(新校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 謝國楨，〈明清野史筆記概述〉，收入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 81-96。
-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闕紅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體為研究對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Bartlett, Beatrice S.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Baldanza, Kathlene. "The Ambiguous Border: Early Modern Sino-Viet Relations." Ph.D.

- Dissert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0.
- Mark C. Elliott, 〈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1(北京，2014)，頁 29-40。
- Franke, Wolfgang. "Historical Writing during the Ming."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1*. Edited by Frederick W. Mote, Denis Twitchett, 73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譯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張書生、楊品泉等譯，〈明代的歷史著述〉，收入《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785。)
- Gramsci, Antonio, ed., and translated by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 Ho, Wai-kam and Judith G. Smith eds.,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 Kansas City, Missouri: Nelson-Akins Museum of Art, 1992.
- Hay, Jonathan. "The Kangxi Emperor's Brush-Traces: Calligraphy, Writing, and the Art of Imperial Authority."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Edited by Wu Hung and Katherine Tsiang Mino, 1-4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4.
- Ko, Dorothy.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 Lears, T. J. Jackson.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gemony: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3 (June 1985): 567-593.
- Meyer-Fong, Tobie. "Packaging the Men of Our Times: Literary Anthologies, Friendship Networks, and Political Accommodation in the Early Q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4:1 (June 2004): 5-56.
- Ma, Ya-chen. "To Visualize or not to Visualize: Commemorating the Suppression of Revolt in Early Qing China." in *Iconic Revolts: Political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Imagery, in the Series of Brill's Studies on Art, Art Histor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Edited by Monika Renate Barget, David de Boer and Malte Griesse. Leiden: Brill, forthcoming.
- Ma, Ya-chen. "War and Empire: Images of Battle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in *Qing Encounters: Art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Edited by Petra Chu and Ding Ning, 258-272.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15.
- Mei, Yun-chiu.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Waley-Cohen, Joanna.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London: I. B. Tauris, 2006.

##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anchu Culture of Martial Prowess: The Invention of *Fanglue* (Official Campaign Histories) by the Kangxi Court**

Ya-chen Ma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Fanglue* (Official Campaign Histories) was invented by the Kangxi court and was thenceforth compiled until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Fanglue* was an archival collection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his generals concerning the conduct of wars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 and has been cited by scholars as historical documents. Recent scholarship, however, has gradually broken away from the documentary perspective, identifies how archives and records were sometimes heavily edited in *fanglue*, and interprets the compilation with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Qing military culture. Nonetheles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Kangxi invention and his followers' compilations, we need to analyze the origins of the special format of *fanglue*, the context in which *fanglue* appeared, and its effects. Although one scholar has pointed out that *fanglue* might have followed the war memorials compiled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connection and its meaning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In fact, the compilation of the war memorials was so popular that they were not only the records of an official or a specific war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self-expression among officials. The popularity of the war memorials also affected their position in historical writing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Ming memorials, explores their changes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analyses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Kangxi *fanglue*, and concludes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Qianlong *fanglue*. The approach of *longue durée* allows us to trace and comp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ials and *fanglue* in order to reinvestigate the meaning and development of *fanglue*,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 of the Manchu culture of martial prowess.

**Keywords:** *fanglue* (official campaign histories), memorials, Kangxi, imperial prerogative, military culture